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歷史叢書 (23)

杭立武先生訪問紀錄

訪　問：王　　萍
紀　錄：官　曼　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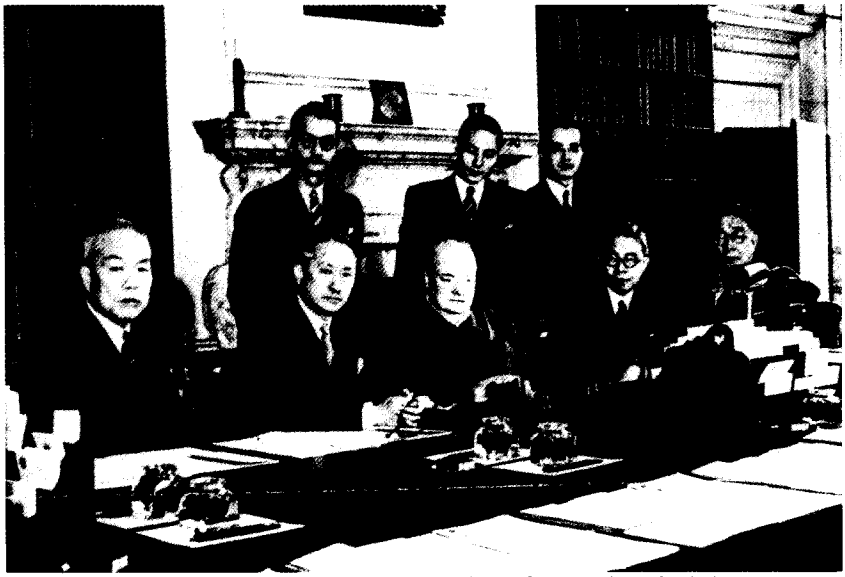
杭立武先生伉儷



杭立武先生全家福（左起：長婿曾君翰、長女愛碧、杭夫人、杭先生、次女韻德、次婿孫綸方、三女韻新、三婿馮慶駒）



民國三十七年時的杭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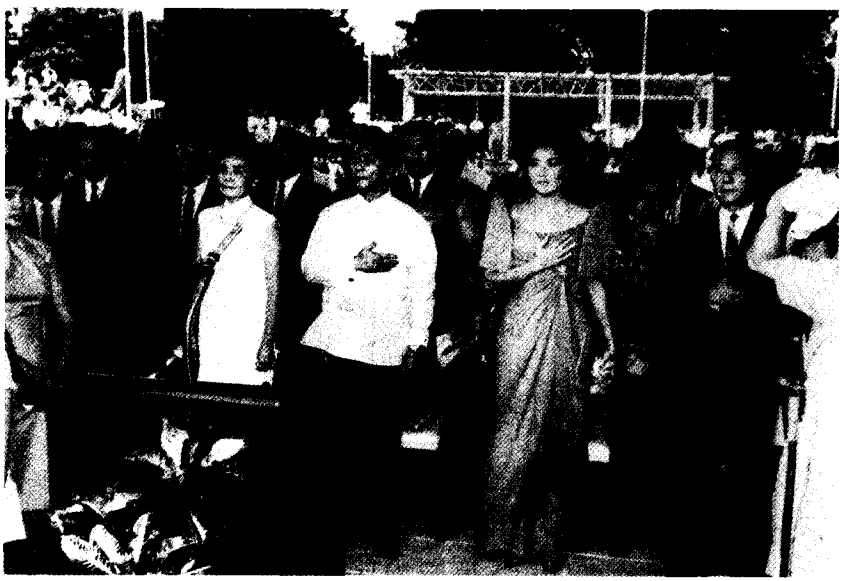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中國訪英團」赴英訪問。後排立者左起：溫源寧、杭立武、李惟果；前排左起：王雲五、顧維鈞、英相邱吉爾、王世杰、胡霖



蔣中正總統偕夫人在臺中霧峰北溝庫房觀賞故宮、中央兩院運臺書畫。左爲杭夫人　（民四十三年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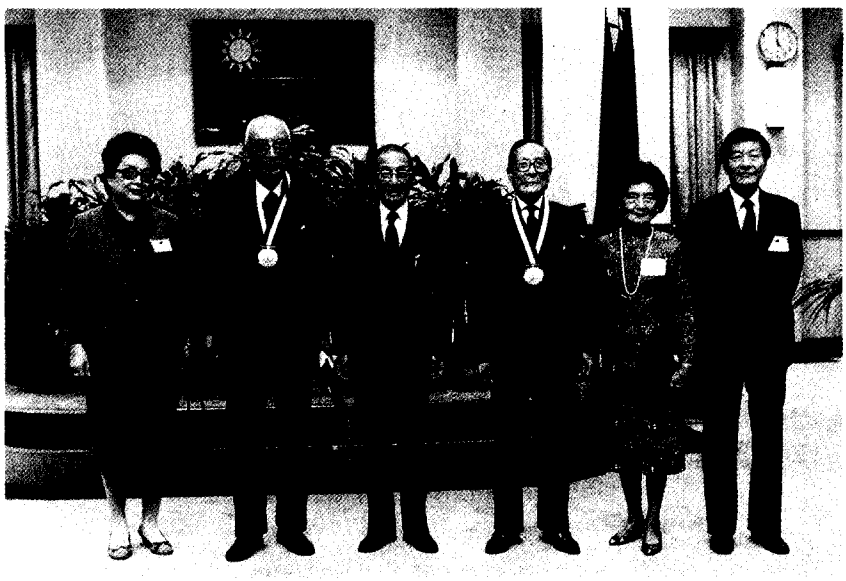
蔣中正總統暨夫人與北溝庫房部分人員合影，其左右各爲杭先生、杭夫人　（民四十三年十二月）



杭大使夫婦參加我國贈送菲國「中國公園」之落成典禮，儀式由馬可仕總統主持。（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杭立武先生拜訪菲總統艾奎諾夫人　（一九八六年七月）



杭立武先生獲頒行政院文化獎　（民七十七年十二月）



與杭夫人攝於八十八歲生日慶祝會



長婿曾君翰、長女愛碧、長外孫女德璧、長外孫大衛
(一九七五年五月)

弁　言

口述歷史訪問計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籌備時期，即由籌備主任（嗣任首任所長）郭廷以擬訂進行，其目的在訪問當代軍事、政治、外交、文教、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重要人物，請其自述生平，爲現代史保留忠實而深入的紀錄，以備歷史學者之研究。自民國四十八年十月起迄六十一年九月止，參加訪問工作者先後有沈雲龍、王聿均等二十二人，接受訪問者七十餘人，成稿六十六份，約四百八十萬言。

口述歷史資料，其重要性不亞於文獻檔案。民國以還，內亂外患交迭相乘，史料損失，不可勝計。對歷史眞相的了解，需要參證當事人口述之處甚多，這些筆錄，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將有莫大的幫助。本所於七十一年開始徵得應訪者（或其家屬）同意，陸續刊印訪問紀錄，列爲口述歷史叢書。七十三年春在所長呂實強推動下，成立口述歷史組，恢復訪問工作。

本所訪問人員力求應訪者盡情暢談，所成筆錄文稿保留口述原意，不予刻意修飾。初稿送應訪者校訂後視爲定稿。惟應訪者記憶難免有所疏誤，或有涉及價值判斷、個人恩怨、政治立場，

而紀錄或有語意不清，印刷或有手民誤植，尚祈讀者賜函指正。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謹識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四月

目　錄

第一章　家世與教育…… 1
一、家世…… 1
二、教育經歷…… 2
㈠基礎教育…… 2
㈡中學教育…… 2
㈢入學金大…… 3
㈣留學英美…… 5
第二章　歸國服務…… 9
一、任職考試院編纂…… 9
二、從事教學與創設中國政治學會…… 9
第三章　參與戰時中英關係工作……13
一、出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13
二、創立中英文化協會……18
三、擔任戰時對英聯絡人……19
四、隨訪英團訪英……20
第四章　救助難民……23
一、設立南京難民區……23

二、安置港大師生……26
三、中泰難民服務……26
第五章　中華文物搬遷簡記……29
一、兩度主持古物搬遷……29
二、搶運河南出土古物……33
三、搶運張大千臨繪敦煌壁畫……34
第六章　從事戰後教育建設……37
一、戰後教育復員……37
二、烽火連天的歲月……38
第七章　擔任總統府顧問……45
一、處理兩航事件……45
二、董理救助中國流亡知識分子……45
三、籌辦東海大學……47
第八章　折衝樽俎，服務僑社……49
一、駐泰國大使……49
二、兼駐寮國大使……52
三、駐菲國大使……53
㈠成立防火會……53
㈡解決逾期遊客與廢止僑校問題……53
㈢協助馬可仕競選菲國總統……55
㈣菲國副總統訪華……55
㈤建贈中國公園……56

㈥促進中菲友誼與加強僑界團結……56
㈦震災……57
㈧離職……57
㈨協助艾奎諾……58
四、駐希臘大使……59
第九章　擔任國關研究所主任……63
第十章　推動反共與人權工作……67
一、出任亞盟秘書長……67
二、成立中國人權協會……68
三、推動自由民主和平統一運動……73
四、成立亞洲與世界社……75
五、促進太平洋海上交通安全……76
六、放眼未來……77
第十一章　談幾位聞人……79
一、陳立夫……79
二、李國鼎……80
三、李登輝……80
四、連戰……81
五、端木愷……81
六、蔡元培……82
七、閻錫山……83
八、吳貽芳……83

九、賈景德……84
十、淩鴻勛……84
十一、楊杏佛……85
十二、戴傳賢……86
十三、傅斯年……86
十四、蔣復璁……87
十五、孔祥熙……87
十六、周恩來……88
十七、孔德成……88
十八、張羣……89
十九、梅光迪……90
二十、顧孟餘……90
二十一、宋慶齡……91
二十二、胡適……92
二十三、汪精衛……93
二十四、鄭天錫……93
二十五、張君勱……94
附件　艾奎諾先生來函……60
附錄一　杭夫人談杭立武先生……**紀錄：黃銘明**…97
一、對家庭的態度……97
二、個性和嗜好……100
三、養生之道……102

四、宗教信仰…… 106
五、惱人的重聽…… 106
六、平淡之交…… 107
七、杭夫人的家世…… 107
附錄二　杭立武先生年表…… 111
附錄三　杭立武先生著作目錄…… 115
附錄四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hae Conference" by Dr. Han Lih-wu…… 125
附錄五　第三十三屆亞盟大會(1987.8.16～8.23)報告 Dr. Han Lih-wu …… 133
附錄六　參考資料…… 144

訪問時間：民國七十六年十月二日至七十七年四月十五日

訪問地點：臺北市光復南路102號8樓亞盟杭先生辦公室

訪問次數：五次

訪 問 人：王　萍

紀　　錄：官曼莉

第一章　家世與教育

一、家　　世

我於民國前八年出生於安徽滁縣。先世原籍浙江杭州，清末洪楊之亂起，先祖錫和公携家南遷，仍承舊業，經營銀號，家貲豐足。

先嚴銘渠公自幼聰慧，好學敏求，及長，有志科考，惟因非滁縣本籍，受到當地士紳之歧視。先祖遂變賣部分產業，捐資餽贈滁縣士紳，銘渠公始得參加鄉試，登科甲，入宦途。逮國民政府成立，公出任唯一之滁縣參議會議長。公性廉介，守正疾惡，甚得鄉民敬重，有政聲。任內影響特別深鉅者有三：

㈠提倡禁煙毒。

㈡禁娼。並身先表率，嚴拒賀客以娼爲壽禮。

㈢糾舉貪瀆惡劣的州縣長及各級幹部。其間，曾遭受被糾人員之抗爭，但是先嚴仍秉持爲社會除害之原則，堅持糾舉，並獲民眾之支持，終能順利除去不肖幹部。甚至位居要津者亦在糾劾之列。

滁縣舊名滁州，地當滁河之陽，瀕滁水支流小沙河，山高水清，爲江淮間勝地。宋歐陽修嘗知本州，州南有醉翁、豐樂兩亭，修嘗爲之記。元末郭子興起事於此，爲明太祖先聲。

二、教育經歷

㈠基礎教育

我的啟蒙教育與小學教育，由先嚴在家親自督課。時先嚴在家開設學館，學生數十人，分級上課。先嚴對我屬望極殷，是以督責特嚴。先嚴頗受當時新思想新潮流之影響，講授國文、歷史等課目，不講四書、五經。同時禮聘滁州郵政局長某君擔任我的英文教習，故我英文教育奠基甚早。至於中國古典文學，則在大學畢業以後，始自行修習。若早年卽能究心博覽六籍，也許我的國學程度會比今日好些！對此我一直引爲憾事。

宣統元年，滁州州政府考選幼童代表應試，清廷委派來查學的督學主持。我因年紀還小，並未參加考選，州政府卻指派我爲代表。記得當時督學問了我幾個問題，我一一作答，他摸摸我的頭，連聲讚道：「好！好！你這個小孩子很不錯！」

㈡中學教育

民國二年，我入滁縣基督中學，該校爲教會學校，修業期限四年（後改爲六年）。五年夏，我自該校畢業，考取南京金陵大

學附屬中學。就學甫一年，先嚴因我成績優良即鼓勵我赴上海試考清大。他說：「沒關係！到上海玩玩！」此行主要爲赴上海青年會聽孫先生演講。先嚴對三民主義也沒有深入的研究，但是他十分欽慕孫先生愛國救民之職志。我則雖然不能完全聽懂孫先生的演講內容，但覺得十分感動。記得那天當孫先生演講完畢，我見邵力子等人隨孫先生走進一個小房間，也跟著進去，看見邵力子等人將剛才紀錄的演講筆記，呈請孫先生修正。當年邵力子等人還只是一介窮書生，微不足道，孫先生卻沒有絲毫的官僚氣息，欣然而親切地爲他們修改筆記。這一幕，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對我日後的做人處事，有很大的影響。舉一例言之，我擔任教育部長時，教育部的同仁稱我「部長！」我都要他們改稱「先生！」我個人也因受到孫先生的人格感召，後來即加入了國民黨。

清大新生考試放榜結果，我未獲錄取。有時想想，覺得人生實在很奇妙！當年如果我順利考取清大，我這一生的經歷將全然不同於今日。

㈢入學金大

民國八年，我自金大附屬中學畢業後，直升金陵大學，主修政治學。在校期間，除了本科系的課程以外，我還選修了哲學、文學……等課程。我選修 Clarence Hanmilton 教授的哲學課時，與方東美是同班。方東美，安徽桐城人，當時他是文科哲學

系的學生，篤志好學，十分用功。但是他的考試成績，卻往往不如我。Hanmilton 教授對方東美在課堂上回答問題的表現，也不盡滿意。反而比較贊同我的見解。我的成績雖然比方東美優異，但這只是因爲我具有一般的見解而已，而方東美博覽羣籍，又肯下功夫，專研深究，日後終於成爲哲學大師。

回想學生時代的事，覺得很有意思。記得有一次，我、方東美與康瀚等人在學校餐廳用早餐時，方東美一面專心在想事情，一面吃花生米，一粒接一粒的，吃個不停，看得康瀚好氣，趕緊對方東美說：「你一個人快把花生米吃光了，不能這樣的！」方東美說：「我只吃花生米，又沒吃別的菜！」兩人竟爲此吵起架來。康瀚人高馬大，孔武有力。方東美平日一付書生模樣，竟也捲起袖子，擺出拳術的架勢，威脅康瀚說：「我小時候學過拳術的！」眾人見情況不對，趕忙將兩人拉開。

我與方東美仇儷很熟，民國六十六年方東美過世時，我還是治喪委員會一員。有一件事，恐怕很少人知道，方東美是中國青年黨的發起人之一。但是方東美對組黨並沒有太大的興趣，他主要的興趣是偏重在學術研究方面。

我在金大求學時期，同時在東南大學暑期班選修梅光迪的西洋文學。梅光迪主張文言不可廢，遂與提倡文學革命、主廢文言、改用白話的胡適，相與辯難。在文學上，我同情梅光迪的主張。我個人不擅長白話文，而偏愛曹丕與其弟曹植之文章。

我在梅光迪的課堂上，經常發表意見，與他研討。我與他的

情誼，可謂亦師亦友。他還幫我介紹過女朋友！金大畢業前，我譯「將來之大戰」一書（The Next War），即藉梅光迪與商務編譯館編輯的關係，交由商務出版。後來我之所以出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也是由於梅光迪和蔡元培的引薦。日後，我供職教育部時，爲梅氏伉儷出力很多。所以說，一個人的人際關係在大學階段就很重要。

㈣留學英美

民國十四年，我參加安徽省公費留學考試，考取第一名。（同時錄取的其餘十餘人，日後皆各有所成）隨即北上至北平接受教育部之複試，結果順利通過。複試時，曾經發生了一段插曲。那一年，複試英文科的試題有三大類，分別是：㈠文法：分析句子結構，㈡對時事之議論，㈢作文。雖然我自幼即習英文，但是卻從來不曾學習英文文法。我的英文啟蒙教習、中學的美籍英文教師與金大的英文講師，從不曾教授文法課程。於是我以英文在試卷第一部分文法欄上寫道：「文法屬於中學生的課業，留學考試出這種題目實在不適當。您應該從我的文章來評定我英文程度的高低。」結果，因爲我第二、三大類題作答的很好，主試官還給我九十四分高分。

當時，金大畢業生只有農學院畢業生的學士資格得到教育部的認可。我報考公費留學時，校方爲促成我留學的機會，特准以農學院畢業生的資格報名參加甄試。我既已取得省試的資格，必

須再參加部試。兩試相距僅有三個月，同時還有日常的工作，因自忖在這時期內，我絕不可能精通農業學的專業知識，不如放鬆心情，再前往一試。後來在北平停留的十日期間，我乘便遊覽北平並看了十一場國劇。每晚各看一場以外，週日下午再加看一場。當時北平薈集了最傑出的伶人如余叔岩、楊小樓、陳德霖、梅蘭芳等，其演出水準居全國之冠。據說在南京、上海等地，戲迷多半是「看戲」，湊熱鬧；在北平，戲迷是「聽戲」，在高水平的戲曲表演中，還要品味唱腔。可見北平不但名伶薈集，連戲迷的水準也是很高的。

農學院資格考的試題，多屬於一般性的普通常識，因而我順利地通過這項測驗。那個時期，一般青年學子大多赴美日兩國進修，而我在金大受了幾年的美式教育訓練後，很想多了解英國文化，遂決定於民國十四年赴英國倫敦大學政經學院攻讀政治學。民國十六年，由於拉斯基 (Harold Joseph Laski) 教授之鼓勵，我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擔任名譽研究員。翌年，獲頒威大碩士學位，旋即返英，繼續攻讀政治學，而於民國十八年，完成學業，歸國服務，時年二十七歲。

留英期間，我參加了許多學術、社會活動，如「一九一七年俱樂部」、蕭伯納 (George Bernard Shaw) 等的費邊協會 (Fabian Society) 等是。在校內、校外的活動裏，我有機會聆聽蕭伯納、羅素、威爾斯……等名家的演講。對於他們的演講，雖然有時因內容深奧，而不盡了解，但是他們講演時的風範與滔滔

不絕的口才，深深激勵了當時年輕的我，激發我一股永遠向前的衝勁。日後我執教中大時，經常邀請中外名家如梁啟超、章太炎與來華訪問的蕭伯納、羅素、杜威等人來校講課，並鼓勵學生旁聽（我曾保存有蕭氏的親筆覆函，現已佚失）。供職教育部後，更時常促請各校校長，多邀請名人到校演講，拓展青年學子的視野。學生們對於演講者所講內容，未必能够全然明瞭，但是演講者的議論風範，對青年學生很有鼓舞作用。很可能學生們只聽得懂演講內容中的一、兩句有啟蒙作用的言詞，卻因而受益終身！

我這一生受倫大 Harold Joseph Laski 教授的開創精神與威大 Frederick Ogg 教授踏實任事態度的影響很大，在創新中不致流於虛幻，而落實於穩健實在。

第二章　歸國服務

一、任職考試院編纂

我自英學成歸國後，上海新聞報邀請我出任該報總編輯，我婉拒之。隨即由於滁縣縣長高槐川之引薦，受考試院院長戴季陶之聘，出任該院編纂嗣兼任考選委員會編纂室副主任，同時在母校金大兼任研究教授。考試院考選委員會編纂主任王君，是考選會委員長邵元沖的友人，王君對我的表現有些妒忌，邵元沖對我也無所謂。某日，編纂室開會時，王君發言：「有人提議編纂室不需要設副主任。」這時與會的二十餘人沒有一個人願意發言表示意見。而我個人並不在乎這個職位，遂起身說：「我贊成取消副主任。」旋即辭職，專任金大教職。我一向不喜歡搞派系，在人事安排上，一律就事擇人，更不會以公報私。日後我出任教育部部長時，曾延攬邵元沖手下吳兆棠君，擔任要職。

二、從事教學與創設中國政治學會

民國十九年，我應中央大學之聘，擔任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又因楊杏佛（銓）的推薦，受聘爲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特約研究員。當時的院長是蔡元培先生。我出任中大政治系系主任未久，有鑒於國內學術團體正如雨後春筍，唯獨缺政治學學術團體，因而立意成立有關政治學的學術團體。當時國內的學術中心雖在北平，但在南京、上海、武漢、廣州等地亦不乏傑出知名學者，加以歷年在海內外所結識，認爲政治學方面的人才已經不少，就憑著一股熱誠與勇氣，分函各地知名學者如周鯁生、王雪艇（世杰）、張奚若、錢端升等人，徵詢意見，他們對此擬議，都出乎意料之外的表示支持，因此決定加緊籌備。

民國二十一年我接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一職後，便決心早日成立政治學會，因爲我準備在兩三年後專任該會的職務，這項職務包括補助各項文化教育事業，對我和各大專學校以及文化學術界的接觸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學會於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在南京正式成立，這是中國第一個政治學者的組織。爲借重各方面人才，以及便於協調起見，選出周鯁生、浦薛鳳、錢端升、王雪艇及我爲常務理事，並由我兼任總幹事，負責處理日常會務，學會會址卽暫設於中英基金會的辦事處：南京傅厚岡一號。

民國二十四年，中國政治學會在南京召開第一屆年會，民國二十五年，召開第二屆年會，地點均在南京。時值日本對我外交步步進逼，因此在年會中以外交策略爲主要議題，會中所議方

案，均在會後送請政府參考。

三十一年，中國政治學會隨政府遷重慶，同時召開第三屆年會，依照內政部民眾團體組織條例的新規定，選出王雪艇、錢端升、浦薛鳳、張忠紱、馬洗繁、黃正銘、周鯁生、張匯文、蕭公權、陳之邁與我等十一人爲理事，蔣廷黻、高一涵、張慰慈等三人爲監事，並推王雪艇爲理事長，總幹事仍由我擔任。當時由於局勢緊張，學會活動不多，但理監事則常舉行座談討論國是。對於國是主張與建議，則由會員中擔任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就便在參政會裏分別提案。在學會成立的最初十五年間，由於國際政治紛擾，國內變亂迭起，學會常以實際問題爲研究重心，其間包括了：外交政策、地方行政、憲法草案、非常時期國民政治教育、政治機構方案、地方自治研究、改進吏治等，各項研究方案均分送中央各有關部會參考。

民國三十八年，學會遷臺。四十二年，恢復舉行第四屆年會。我那時已出任駐泰大使。理事長依然由王雪艇擔任，總幹事先後改由黃正銘、杜光塤擔任。六十二年，我回國服務，旋被選爲理事長，王雪艇先生被推爲名譽理事長。八年理事長任內，前後由連戰、陳治世擔任總幹事。六十九年我卸下理事長職務，由連戰接任，七十年我被推爲名譽理事長。

在臺舉行的歷屆年會中，最爲突出的一次，是請當時甫獲任命爲行政院長的俞鴻鈞到會演講。俞院長在年會上首次提出「安定中求進步」的政策。年會的討論，亦集中在此主題。

第三章　參與戰時中英關係工作

一、出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

民國十一年十二月，英國政府宣佈將未到期之庚款退還中國，作爲中英兩國互有利益事業之用。英國政府擬將中國逐期償還之庚款，提存於倫敦匯豐銀行，準備退還。嗣因英國國會改選，此事暫告擱置。民國十四年六月，英國國會通過「中國賠款案」，並成立諮詢委員會，派調查團來華實地調查，研究退還的庚款如何得到最適宜的處理。後來調查團將調查結果，向英國外交部提出書面報告，其中一項爲建議成立退款管理機構，此即爲設置「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簡稱「中英庚款會」）之根據。民國十九年中英兩國正式換文，換文明白規定，在華設立董事會管理英國退還之庚款，另在英設購料委員會，同時確定全部退還之庚款必須充作整理、建築鐵路和經營其他生產事業的基金，再以利息所得興辦教育文化事業。

民國二十年四月，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成立於南京，董事會設董事十五人（其中英籍五人，華籍十人），由中大校長朱家

驊、香港大學副校長賀耐 (William W. Hornell) 分別擔任正、副董事長。該會職責在於保管運用對英庚子賠款，和中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性質類似，不過前者直屬行政院，後者則不在行政院系統內。民二十一年，朱家驊先生擬聘一位留英人才擔任總幹事，經楊杏佛和梅光迪極力推薦我，並經朱家驊約我面談，立刻要我去該會服務。民二十二年，中英庚款會建會所於山西路七十八號。民二十四年我辭去總幹事一職。民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我再度出任中英庚款會的總幹事，所以我前後共擔任中英庚款會總幹事達七年之久。

我擔任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期間，負責管理本會所收英國退還庚款六百萬鎊（時一英鎊約合四點八美元，六百萬鎊合計約三千萬美元）並依照雙方約定，作合理的運用。在當時外匯短絀情形下，深受各方爭取。茲將歷年基金及息金用途，簡述如下：

甲　基金運用簡介：

㈠借充整理、興建膠濟、平漢、津浦、隴海、北寧、京滬、滬杭甬、浙贛、京贛、粵漢、湘桂、敍昆、滇緬等鐵路、與首都輪渡、戚墅堰機廠、株洲機廠等之費用。

㈡借充辦理張福河疏浚工程，廣東金東、金西基圍修理工程、黃河堵口工程、與導淮兩年施工計畫等。今土地研究所所長蕭錚，即當時導淮委員會之總幹事。

㈢用於電力、電訊、航運者，如前建設委員會首都電廠、戚墅堰電廠、中央電氣試驗所、經濟部中央電工器材廠、昆明電

廠、交通部建築國際無線電臺，整理各處有線無線電報、電話設備，建築九省長途電話網，西南西北長途電話無線電話網；與國營招商局購買四海輪等。

乙　息金支配概況：

㈠抗戰以前：按照息金支配標準辦理補助教育文化事業——

1.保存文化史蹟及古物：撥款興建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補助整理影印敦煌經卷等。

2.補助高等教育及研究機關之建築、設備或講座。戰前國內專科以上之學校，無論國立、省立、私立，多受過本會的補助；研究機關方面，其主要院所，亦經本會支助。例如協助燕京大學成立：Modern Greats。所謂 Modern Greats 係結合政治、經濟、社會三個學科而成立的一門新科學。當時，全世界只有英國牛津大學設有該學系。燕大校長司徒雷登請我推薦一名教授出任該校講座，我立即去函牛津大學 A. D. Lindsay, Master of Ballio College，請他代覓適當人選。他回電曰："Why not my son?" 我遂向燕大推薦 Michael Lindsay。未料 Michael 到燕大執教未久，與燕大女學生李効黎交往密切。李是激烈的左傾分子，Michael 則帶有社會主義的色彩，不久兩人竟然投向延安。Michael 並爲延安設置了第一個無線電臺。教育部與中央方面，爲此責怪我推薦 Michael 來華任教。Michael 固然是經我推薦來華執教，但是我不能爲他個人投共的行爲負責。可是他們投共後不久，因不滿共黨措施，又偕李女離開延安，但仍與周恩來、

毛澤東等人保持聯繫。一九五二年，並陪同英首相艾德禮訪問中國大陸。但是後來卻反共。嗣後幾年，更頻頻訪問臺北。他的夫人李女士原先比 Michael 更同情中共，現在也反共，到處作反共演講。對於他們的這種轉變我覺得很高興。

3.考選留英公費生。此項甄試十分嚴格。所有參與命題、印刷、閱卷等工作人員，一律入闈，迄入選名單公佈，始得出闈。我本人並偕同數名教授入闈檢視命題與印刷之可能疏誤，務求考選過程公正、公平。第一屆留英公費生甄試於民國二十九年舉行。甄試結果公佈以前，社會大眾對本會舉行考選留英學生的公平性，不無質疑。迨入選名單公佈，所有入選人員皆各校精英，本會考選留英學生的公平性，立即獲得各界認可。李國鼎即爲第二屆考選的留學生。

4.補助大專、職業學校、農村教育。

㈡抗戰期間，爲適應戰時需要，除照原訂息金支配標準辦理外，另增下列三項：

1.保存文物：

①協助搶運故宮博物院存京庫古物。

②整理影印居延漢簡。

③搜購古籍。

2.補助研究人員：

①爲解決北方各大學教授之生活問題，並充實內地各校的教授，本會在內地各大學設講座數十席，容納北方一部分教授。

②提撥專款補助科學工作人員與科學研究助理。

3.自辦事業：爲配合政府積極建設西北、西南之計畫，本會創辦若干研究及教育機關：

①中國地理研究所。

②中國蠶桑研究所。

③中國美術學院。

④甘肅科學教育館。

⑤湟川中學、河西中學、默江中學。

4.民國二十九年與教育部合辦中國心理生理研究所。

（以上甘肅科學教育館與三所中學後移歸教育部主辦。地理研究所、蠶桑研究所改與教育部合辦。原地理研究所附設的海洋學組，戰後籌備單獨設所。）

伍叔儻、徐公超（可熙）曾先後出任本會秘書處主任。胡秉正、汪繼武亦曾先後在本會負責部分業務。伍、徐兩位均曾任教臺大，現已過世。胡秉正，現年七十餘歲，曾任政治大學心理系主任及教務長。汪繼武，自二十一歲起，即隨我做事。民國三十八年自大陸來臺後，擔任故宮博物院出版組主任多年。近年，我的亞盟秘書處秘書組長鐘健辭職赴美，我調汪任秘書。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自成立以來，各界來函申請補助的信件很多，我手邊曾保存了蔡元培、楊杏佛、張人傑、吳敬恆等名人之親筆書信。這些信件我都交由秘書處理。不知何故，所有的信件後來全部佚失，無一封留存。我一因職務繁忙，又一向只

往前邁進，而不向後看(這也是我的人生指標)，故對於爲後世留名的事情，從不在意。葉公超之叔父葉恭綽，曾任庚款會董事，並與我私交甚篤，常有書信往還。他去世前，交代葉公超，將他親筆給我的八十餘封信件，輯成字集，付梓出版。我卻將所有函件交秘書處，連一封信都沒有自己保留。說起來，我實在很對不起葉恭綽和公超。

二、創立「中英文化協會」

我出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時，正值年輕（當時剛滿三十歲），勇氣十足，不畏艱難，很想有所作爲。先後創立了「中國政治學會」與「中英文化協會」等開創性的組織。

一九三三年，爲推動中英文化交流，在英國駐華大使藍浦森爵士(Sir Miles Wedderburn, Lampson, 1880-1964) 的支持下，我在南京成立「中英文化協會」，這是中國第一個國際性文化友好組織。該會成立之後，中法、中比、中瑞、中美等文化協會亦相繼成立。直至今日，由我陸續在國內及香港以至倫敦倡立之「中英文化協會」，仍在致力於促進中英文化關係的工作。

「中英文化協會」成立之後，在南京住宅區曾建造一間兩層樓的會址，並雇用一位高級管理員。若干學者如胡適、楊端六、錢端升等，由北平、武漢各地到首都的，都經常住在那裏。我們也有定期的聚會，講演遊藝等節目，在國內文化團體裏最爲活

躍。

抗戰時撤退到重慶，中英文化協會亦有其自建的會所。迨中英聯合作戰後，協會更形成中英人士聚會聯歡的場所。勝利後由渝回京，恢復運用山西路的會址。記得當時聘用一位留英同學楊憲宜教授任管理員。後來發現他受中共滲透利用，可是並沒有做錯事，我只有另找一位助理監視他。

由南京再來臺灣，我們很幸運由國防部撥給我們一座房子。那是留英同學宋長志任參謀總長時的決定。中英文化協會也改稱中英文化經濟協會，有會員五百餘人。除按月舉行專題講演外，並每年舉行「英國之夜」與「中國之夜」兩次特別節目，此外還有旅遊參觀等項活動。這些節目的安排多賴總幹事陳奇祿、執行秘書程振粵和節目委員會的中英委員們合力策劃與執行。

三、擔任戰時對英聯絡人

抗戰期間，蔣先生派我擔任委員長與英國駐華大使及邱吉爾首相駐華私人代表獨眼將軍魏亞特(Gen. Sir Carton de Wiart)的聯絡員。

二十九年七月，英國應日本要求，將滇緬公路封閉，禁止軍事資源運達中國。此一事件，使中國人甚感驚訝與失望，尤其竟發生在邱吉爾出任首相之後。蔣先生很生氣，找我去，要我向英國提出緊急呼籲。記得那天，蔣先生十分激動，他用力往桌面一

拍，對我說：「你去向邱吉爾說，我們對他出任英國總理，抱了很大的期望，現在他竟然幫助日本，切斷滇緬公路。」因爲情緒太過激動，蔣先生的一整副假牙竟自口中掉落地上。我原先不知道蔣先生全是假牙，當時見假牙掉地，立卽伸手想撿拾假牙，還沒來得及撿，蔣先生將我的手拂開，自己撿起假牙，放進嘴裏。從這件事，可以看出蔣先生的軍人氣概。

我隨卽啟程赴英見邱吉爾，邱吉爾表示：「英國之力不能應付日本，封閉滇緬公路，僅爲拖延之計。三個月之後，滇緬公路一定重開。」是年十月，英國履行此一諾言，重開滇緬公路。

邱吉爾與蔣先生兩人意見雖不一致，但是相互欽慕。

四、隨訪英團訪英

民國三十二年底，「中國訪英團」一行六人，由團長王世杰率領，赴英格蘭、蘇格蘭作四十天訪問，以答謝英國國會代表團之訪華。團員包括胡霖、溫源寧、王雲五與我四人，另有秘書李惟果。此行受到英方之熱烈款待，頗有收穫。

次年一月下旬，邱吉爾北非病癒返英倫後，在世界聞名之唐寧街十號舉行閣議之會議室接待本團，與本團談約半小時。邱氏著防空便服，據聞邱氏在戰時因工作緊張，多著此服，取其便利。

是日談話，邱氏以鄭重語調申述英國必以軍力迫使暴日無條

件投降，才算對得起我們這一代和下一代。語時沉著，字字鏗鏘，儼然對中國國民之保證也。本團辭出後，見隔間十一號之財政部官邸被炸燬，我原擬探詢被炸時之情形，忙中遺忘，未及詢問。迨至北非，無意間翻閱一九四三年九月四日英國出版之某刊物，內有財政部官邸炸後照片，編者註曰：「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七日夜十八日晨之交被炸，首相是晚有閣議，夜深始散，時正進晚餐，距中彈處不及百尺。」寥寥數語，足以顯示戰時英國之緊張氣氛與邱氏之鎮定與偉大。

「中國訪英團」訪英期間，曾經發生了一段賽酒插曲。有一次，英國外交部、情報部的兩位代表，陪我們吃飯，他們的酒量很好，要與我們賽酒。然而在訪英團中，只有王雲五與我兩人能喝酒。我們倆合力將英國代表灌醉，睡倒在地毯上，王雲五見我酒量不錯，對我說：「立武兄，我不知道你能喝酒！我們再來！」我對他說：「明早還有活動，你把我打倒了，我把你打倒了，都不好！」王雲五說：「對！對！等回國再說。」

三十三年三月，訪英團返抵國門後，王雲五曾將訪英見聞集爲「訪英筆記」（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有「杭某人酒量很好，我要與他比賽吃酒。」等語。但是因爲我與王雲五自英返國以後，工作都很繁忙，一直沒有機會比賽吃酒。王雲五病故前，我經常到他府上探望他，記得最後一次探病，我正向王雲五告辭時，他突然捉住我的手，對我說：「立武兄！今生不比，來生再賽。」我聽了心中頗有所感。當時王雲五的病情都已經如此沉重

了，竟然還提到賽酒事？推究其因，可能因爲王雲五有強烈的不服輸個性，使他一定要與我比賽吃酒，分出高下，因而在病中依然念念不忘。這種好勝而又無奈的話語，令人聞之唏噓不已！

訪英團在倫敦時，我曾被邀至英國國會作講演，國會議員旁聽者有數百人，我講後離開會場時，發現副總理工黨領袖艾德里坐在後排，我和他拉手，心中欽佩他的謙沖。

英國眞正做到全民作戰的地步，我們到倫敦以外各地區參觀，多半是婦女用自己的車子陪伴接送，開車時還有時唱歌助興，使客人有溫暖的感覺。

第四章　救助難民

一、設立南京難民區

「人生以服務爲目的」，是我一貫的信條，而難民服務，尤其有它的崇高意義。從抗戰開始，一直繼續到現在，難民服務和我有不解之緣。

民國二十六年冬，國軍在與日本敵軍奮戰三個月之後，由津浦路撤退到南京附近。政府則已西遷。南京城內四分之三的居民與大部分的外國僑民，或已離京，或正準備離京。此時自前線退下來的國軍大批湧到，市內一片混亂，首都危在旦夕。在此之前不久，我閱報得知，上海有一位饒神父，在上海設立難民區，救助了許多婦女和兒童，當時我擔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同時也是金大校董會董事長，我覺得日本卽將進攻南京，鑒於情勢危急，特邀集在各教會學校服務的美國友人和少數英、德商業人士約二十人，共商應變辦法。決定援照上海難民區的先例，成立一個國際救濟機構，定名爲「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Nanking Safety Zone)，劃金陵

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鼓樓、山西路住宅區直到新街口一帶爲安全區，收容無家可歸的難民。此安全區亦稱「難民區」。安全區範圍劃定後，乃委託上海饒神父在上海徵得日軍司令的同意，後來饒神父答覆我，說日本司令答：「我們知道這件事了。」並且接受了地圖。在進入南京城的日本兵身上，曾發現這種地圖，是有難民區。

「南京難民區」委員，爲美籍史密斯 (Lewis S. C. Smythe)、梅奇 (John Magee)、畢戈琳 (J. V. Pickering)、斐志 (M. S. Bates)、密爾士 (W. P. Mills)、德利謨 (C. S. Trimmer)、李格斯 (Charles Riggs)、英籍福婁 (P. H. Maaro Faure)、希爾滋 (P. R. Sields)、麥寇 (Ivor Mackay)、里恩 (J. Lean)、德籍拉比 (John H. D. Rabe)、潘亭 (G. Schutze Pantin)、史波林 (Eduard Spering) 與丹麥籍的漢森 (J. M. Hanson) 共十五人，公推德人拉比爲委員會主席，美人史密斯爲秘書。我與費吳生分任安全區主任與副主任。旋因我奉命護送故宮博物院文物西赴重慶，難民區主任職務遂由副主任費吳生代理。當時，首都衛戍總司令唐生智，應允將安全區內的軍事機構遷出，撤除高射砲陣地，以確保安全區的中立。市長馬超俊離京前夕，將市政府及一切物資以及四百五十名警察全部移交安全區。張羣並提供私宅供我作辦公室之用。十二月十日起，難民紛紛湧入安全區，各處很快就已住滿，只好徵用最高法院及僑委會的房屋。

南京危急時，南京衛戍司令唐生智，借我的中英文化協會辦公大廳舉行記者招待會，並請我幫忙翻譯。他說：「我要同南京共存亡！」當時我不敢立即翻譯，我對唐說：「唐先生，你這句話要負責任的哦！」他說：「你不相信我？」於是，我就翻譯了，我理直氣壯地一翻譯，大家都鼓掌了（可是唐並未死守，他撤退得很早，說是保存實力）。

十二月十三日，日軍一入南京，就開始搶了，原先他們要求放三天假（所謂「放假」是讓他們隨便搞），實際上不只三天。日軍在十六日進入難民區，十六日以前在難民區以外的地方，見到婦女就抓，難民區日記每日都記載了日軍暴行。

最初一些自上海等地退出來的國軍士兵，見難民區比較安全，紛紛湧入難民區。日軍遂藉搜查爲名，進入難民區搶奪、姦殺……。難民區的負責人到日本使館交涉，使館派一名憲兵接見，沒有結果。事實上，日本憲兵在晚上也是一樣地搶。日軍的搶奪等暴行，一直持續到月底。難民區則因有英美人在巡視、照相，並在外國報紙宣傳，所以比其他地方少受蹂躪，而且期間較短。

南京大屠殺究竟犧牲了多少人？根據難民區日記記載，中國紅十字會在南京就收屍埋葬了十二萬人，此外也有人估計被殺了二十萬或三十萬人左右。紅十字會收屍是確實有紀錄的數字，因此，南京大屠殺犧牲的人數，不止十二萬人。

二、安置港大師生

民國三十年太平洋戰事發生，留學英國的馬來亞、新加坡學生因家鄉淪陷，經濟斷絕，紛紛逃至重慶就業就學。本人適任國際學生救濟委員會會長，乃盡力予以支援。迨香港淪陷，港大師生數百人由港輾轉逃避到重慶、成都等地，那時我適任職教部，乃一面分別對教職員予以安置就業，對學生分配就學，並對就學的學生按月給予救濟金。

三、中泰難民服務

迨越南爲北越所吞併，高棉與寮國相繼赤化，華僑與各該國自由人士相繼逃至鄰近國家，尤其到泰國邊境有數十萬人。爲救助此類難民，我以人權協會名義，發起組織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並承國民黨中央及社工會贊助，召開十九個單位的聯席會議，決定成立該團，並設置執行小組，由中國紅十字會、中國佛教會、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國際扶輪社中華民國總會及中國人權協會等五個單位組成，並由中國人權協會任召集人。計自民國六十九年四月開始派遣服務人員赴泰，最初與泰國難民救助委員會主席差納少將合作，並簽訂協議書，作爲進入泰國開展工作之法律依據。初期服務係以華裔爲對象。經過五年的不斷工

作，每年耗費近一千萬臺幣，每三個月由臺派遣服務人員五位左右，另從難民中選派服務人員若干人，服務成果終被聯合國難民高級專員在泰代表所肯定，並經泰國內政部要求對難民服務應不分種族，擴大到所有難民，乃自民國七十四年正式加入國際難民服務團協調委員會，而成爲聯合國所屬組織之一員。

我應特別指出的，是引起我對泰邊境難民的關懷的，是好友劉介宙，他父親是旅日僑領劉天祿先生，在我宴請他時，偶而談及難民服務，他就慨助美金七千元作爲開辦費。後來我偕同介宙赴泰視察各難民營，終於成立中泰難民服務團，便聘請介宙爲服務團總幹事，所有實際工作，介宙是始終參加的。我一面以繼續此項難民服務爲無上職責，一面亦顧慮東南亞的不安定，使難民救濟不知何時才能告一結束。

我和每期赴泰工作的青年男女，談及難民服務，我必告以這是他們未來最值得回憶的工作。我自己就有這經驗。民國七十一年四月我去新加坡參加會議，忽然接到一個請柬，主人很有地位，但我不認識。我到了後，才知道那二十餘位主人，都是我在重慶時救助過的新加坡留學生。他們回到新加坡後，在社會各階層，都各有成就，他們合送了我一個銀盾，那是我最難忘的一次餐會，並使我更肯定難民救助的意義。

第五章　中華文物搬遷簡記

一、兩度主持古物搬遷

美國雷德福將軍 (General Arthur Redford) 曾經說過：臺灣有三件事值得自豪——一是經濟繁榮，二是軍事進步，三是擁有輝煌燦爛的歷史文物。可見中國文物，在外國人的心目中，與經濟軍事同樣重要。我之所以與這些寶貴的歷史文物，發生不解之緣，是由於偶然觸及而發生的。當我在進行籌劃南京難民區時，南京市長馬超俊建議我將朝天宮故宮博物院也納入難民區範圍內，以維護文物的安全。我告訴他，這不但不容易辦到，且並不保險。難民區地區圖已送日軍司令知照，擬修改區域範圍，恐怕並不容易。而且我雖然身爲難民區之發起人，但是我自己對日軍之尊重難民區並無太大信心，故宮收藏的文物，世罕其匹，諒必難逃刼持與偷盜。我想，馬市長既然提出此事而我無能爲力，我應向蔣委員長報告。遂面見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張羣先生，建議將這批文物盡快運到後方。張羣立卽去電杭州，請示蔣先生。次日，張羣約我到國防最高委員會面談，他告訴我，蔣先生

已覆電核可。我聽了很高興，準備起身告退，不料，張羣接著又說：「委員長囑你負責搶運。」當時我身爲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發起人與難民區主任，怎能脫身呢？我遂向張羣表示：「南京難民區的工作緊急迫切，恐怕沒有時間處理古物搬遷。」張羣說：「那就請你自己去對委員長說吧！」我鑒於此事之緊要，乃決心排除困難，負責搬運，至於難民區的工作則請難民區副主任費吳生代理主任職務。

中英庚款會董事長朱家驊時任浙江省府主席，獲悉古物正在搬遷，來電表示贊佩，並同意動用基金會款項，以應急需。但因當時缺乏現金，我遂向關務署英籍總稅務司借用現款數十萬元，用以紓解燃眉之急。

這次古物搶運計畫分水、陸兩條路線。陸路由軍委會調撥車輛，循津浦鐵路轉隴海線至寶鷄，再以卡車護運入川，由故宮博物院之莊尚嚴、那志良協同負責搶運。水路方面，洽租英商輪船上溯長江運至漢口轉運四川，分別貯藏在樂山、峨嵋等島。由楊師庚及中英文教會部分職員暨故宮吳玉璋等協同搶運。搶運工作自二十六年十一月開始，到二十八年四月才告完畢。

抗戰勝利後，西遷的國寶全部運返首都南京，先後有中研院與教育部聯合舉辦的慶祝還都擴大文物展與中央、故宮兩博物院文物聯展。三十七年冬，徐蚌戰事緊張，我以故宮董事會秘書名義發動故宮、中央兩院部分理事會舉行聯席會談，決議成立小組，將兩院存京文物，提選精品遷運來臺。小組成員包括王世

杰、朱家驊、傅斯年、李濟與我。小組旋決議由我全權負責執行文物渡海南遷臺灣。

這時，中研院史語所、中央圖書館與外交部也決定分別將文物、善本書籍、重要檔案（包括條約原本）加入兩院文物，隨同運臺。遂由五個機關各派一名代表合組一個委員會，委員會公推我負責總持一切，由我籌款、洽定船隻、計畫搬運。

遷運工作自三十七年底至三十八年二月止，五個單位共運出文物三批。分別由海軍部中鼎艦、招商局海滬輪、海軍部崑崙艦承運，其中兩院文物計三千八百二十四箱，兩院精華十之九五已經運臺。所有運臺文物，承當時臺中市長陳宗熙的介紹，暫借臺中糖廠爲臨時倉庫，作爲寄存地方。同時收買北溝林氏園地，興建庫房，作爲兩院文物遷臺新居，並進一步計畫開放展覽及從事研究等工作。

三十八年我就任教育部長後，將兩院及中央圖書館，暫行合併組織爲「國立中央博物院館聯合管理處」，直屬教育部，我兼任主任委員。三十九年，兩院原任理事決定建議政府組織兩院共同理事會。四十四年一月，院館聯管處改組爲「中央運臺文物聯合管理處」，同年十月，改稱「國立故宮中央博物院聯合管理處」。當時，曾有人在報上撰文指稱：「搬運來臺的古物，有無損失，或甚至被人掉換，應該進行清點！」我爲證明事實，遂請行政院澈底清點古物。三十九年七月，兩院共同理事集會臺北，決議成立清點委員會，點查運臺國寶。其點查之範圍，包括兩院

全部遷臺文物及中央圖書館圖書。清點委員包括中國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人員，有陳啟天、李濟、黃君璧、蔣穀蓀、高鴻縉、孔德成、董作賓、高去尋等，羅家倫爲召集人。清點辦法乃依據原有清册，逐箱開驗，核對文品名稱、件數、品質等，由在場清點委員逐一點明，並註明「清點無誤」字樣，驗畢交原保管人簽封，繼續負責保管。自四十年至四十三年，經過四次點查，結果圓滿，中華國寶在烽火緊急之中，歷經海陸舟車轉運，幸無損失。我原本自信且相信同人視國寶如第二生命，至此益覺安心。

文物貯存新庫後，陸續有中外人士要求參觀，但因沒有展覽室，只好在庫房中，支起木板，敷上白布，陳列數十件在上面，招待各界參觀，既不方便，參觀者也不能滿足，而且每年維護費用，需數百萬元。民國四十四年，我向財政部長徐柏園請撥專款建造小型展覽場所。徐柏園說：「沒錢。」我乃向亞洲基金會駐臺代表饒大衛（David Rowe）接洽。四十五年五月，亞洲基金會決定補助新臺幣六十八萬八千元，興建一座可供陳列數百件文物的展覽室兩大間、存放衣物與出版品出售處各一小間、辦公室二間。當時，有人在國民黨中央常會說：「要美國人出錢建中國文物陳列室，這是中國人的恥辱！」主席蔣先生不說話。我後來再向徐柏園表示：「既然有人有意見，我願將這筆款子還給亞洲基金會！」徐柏園仍認爲中央不能撥款，接受外援並無不可。實際上，當年國庫確實短絀。而且巧合的是八年後臺北外雙溪的故

宮博物院現代化的建築，還是運用美援基金撥建的。我常說，這些國寶是人類才藝的結晶，不其然乎！

四十六年三月，新建臺中庫房開始定期展覽，公開售票。每一個月或二個月更換展出文物一次。參觀的人潮日漸增多，引起廣泛興趣，此爲日後在臺北外雙溪興建故宮博物院的先聲。展覽室興建前後，蔣先生常偕蔣夫人到北溝視察參觀，每屆年終，總統府並撥獎金給該處全體員工，予以鼓勵。

二、搶運河南出土古物

三十八年十一月間，戰火蔓延西南，重慶告急。當時我正忙著疏散業務。一日，河南籍的立法委員李雅仙、楊一峯、張金鑑等，急迫地到教育部找我，他們表示豫省出土的古物珍品六十八箱，在抗戰時運到後方，至今依然存在重慶中央大學柏溪分校的防空洞裏，希望我能設法將該批古物運臺。這雖不屬教育部工作，而且他們也曾分別向行政院及內政部請求，但我對古物保存的責任感，驅使我立即晉見蔣先生，蒙指撥軍機二架輸運。貯存古物的中大柏溪分校的防空洞，並不通公路，如何將古物箱件取出，搬上小船，再在碼頭裝車運至飛機場，實在是個棘手的問題。經與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再三商洽，在運輸工具萬分艱難的情況下，指派二三三號及三〇六號運輸機負責空運來臺。預定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晨起飛。我派教育部總務司司長班鎭中及社教司司

長程行可、專員何九思負責將古物運往機場，同時洽請重慶大學協助。二十七日晚，因交通困難，工具缺乏，古物仍滯留柏溪，未能啟運。我萬分焦急。趕到空軍第五軍區司令部，懇商延緩飛機起飛日期，同時派青輔會陳勻趕赴柏溪，協同搶運，經同仁通宵努力，才把古物運到船上。二十八日中午，抵成渝碼頭，準備卸船裝車。當時重慶情形十分混亂，船無法靠岸，接運的三輛卡車也不能準時到達，延至下午，始陸續起卸。二十八日深夜，三卡車古物始全部到達機場。但是河南博物館的人員迄未到場，亦未開列清册，箱上亦無封條標籤，而空軍飛機不允拖延時間，我只有准予從權搶運，於深夜三時裝載完畢。二十九日上午，起飛離重慶，押運來臺。這批古物，初交中央博物院臺中庫房代爲保管，數年後由教育部撥歸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庋藏，公開展覽。

河南文物之搬遷，較以往倉促而緊張。記得在決定之初，我召集幾位同事商量，咸感任務艱難。總務司司長班鎭中因負責同事與眷屬的撤退，非常焦急，他問我：「要人還是要古董？」我說：「都要。」他說：「難。」我說：「盡力而爲吧！」結果文物搶運了半數以上，人卻丟下一位。

三、搶運張大千臨繪敦煌壁畫

三十八年十二月九日，我隨行政院長閻錫山在成都新津機場

乘最後一架飛機撤退來臺。同機尚有政務委員陳立夫、行政院副院長朱家驊、秘書長賈景德等人。記得那日，我趕到機場上機時，見閻錫山坐在一口箱子上，身體搖搖晃晃的，神情若有所思。朱、陳兩人對我說：「我們的生命全操在他坐的那兩口箱子上。」原來，這兩口箱子裏裝的全是黃金。重量超重，對飛行安全構成威脅。陳、朱兩人認爲我與閻百川的交情比較好，要我說服閻，不要帶黃金走。我想，這是不可能的事。閻携帶這些黃金，並不是爲了他個人，而是爲了山西人的生活著想。我於是向陳、朱兩位建議，勸閻放棄這些黃金，而由我與陳、朱三人簽字保證，於抵達臺北後，請蔣先生補償他同額的黃金。陳、朱認爲做不到。

飛機即將起飛，張大千乘張羣的車子匆匆趕來機場，並帶了七十八幅敦煌臨繪壁畫，請搭同機空運臺灣。當時飛機載重已經飽和，駕駛員不答應再增重量，陳、朱兩人對我說：「保存文物是你的責任，你還是叫閻錫山把黃金丟下吧！」我遂臨時決定以我私人的行李三件，換載張大千的畫。我對張大千說：「我這三件行李中，有我全部的積蓄二十幾兩黃金（當時政府以黃金發放薪俸），我爲你犧牲了二十幾兩黃金，到臺北後，你的畫要贈與政府。」張氏立表同意，當場寫了張名片，作爲贈送的證明。

這批壁畫運到臺北以後，第四日，張大千持張羣的信函，要我把這七十幾幅畫借給他携至印度展覽。我知道這是張要畫的方法，但一想如能赴異邦展覽，亦是宣揚國粹。我遂答應張氏取回

七十八幅畫的請求。後來我才聽說，這七十八幅畫作中，有六幅是張大千私人收藏的古畫，並不全然是敦煌臨繪壁畫。七十二幅敦煌臨繪壁畫，過了好幾年後，張氏總算送交故宮保存陳列。

第六章　從事戰後教育建設

一、戰後教育復員

三十三年十二月我出任教育部常務次長，三十五年十月十六日，調任教育部政務次長。這段期間，最主要的業務爲協助策劃戰後教育復員。其時遷移員生合計十萬餘人，包括中等學校三十八所，員生四萬餘人；專科以上學校及機構，六十個單位，員生六萬四千餘人。由教育部與各方洽妥交通工具，發給還鄉旅費，以水陸空運陸續送往京滬，復員還鄉。當時因收復區專科以上學校多已停辦，教育部於派員接收後，特在北平、上海、南京、廣州、武漢、青島、瀋陽等地分設臨時大學補習班，安置原有學生，繼續學業，安定員生的生活。

我任教次時，同時兼任中央設計局教育組召集人，教育組所擬各項教育復原計畫，雖與實際有顯著的不符合，但仍有可資參考的。

二、烽火連天的歲月

三十六年以後一直到三十九年是烽火連天的歲月。尤其是三十八至三十九年，大家都須隨時應變。這兩個年頭我在教育部長任內面對戡亂現實，教育部的措施，一方面在配合文化任務，積極維護自由教育正常發展，一方面對流亡員生進行扶助安排。以遠大胸襟保存學術文化的生機，並爲後代子孫開拓嶄新的生命。扼要地說，戰時教育工作實施概況如後：

㈠分區設置青年輔導機構：

三十八年春，共軍渡江南犯，北方青年紛紛集於上海、浙、贛、湘、桂、粵、閩等地，教育部爲因應需要，乃在衡陽、廣州、成都等地成立青年輔導處，並於杭州、寧波、深圳、海口、柳州、桂林、株洲、武昌等地設置青年招待站多所，爲流亡員生隨時提供服務。

㈡廣設臨時中學及聯合中學，並分發大專學生寄讀：

三十八年前後，由於戰區日漸擴大，流亡學生日眾，教育部特設臨時中學及聯合中學六十七所，容納學生十一、二萬人。這些學生，因軍情狀況瞬息萬變，有逃出戰區而復淪陷者，有軍情緊急義憤填膺，自動請纓而成仁者，有於淞滬、廣州撤退直接來臺集體從軍者，有隨教育部遷調分發寄讀者。

㈢接待南來教授：

教育部特在廣州設置接待南來教授委員會，並資助其來臺後，由教育部聘爲特約編纂、編審，組成委員會，按教授、副教授支領月薪，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日後，這些教授在學術及教育發展上，皆有極可貴之貢獻。

㈣上海保衛戰教育與軍事的密切配合：

三十八年五月，上海已進入戰事邊緣，守衛當局積極備戰。負責淞滬地區警備任務的單位與本部密切聯繫，嚴防學生學潮影響士氣人心。當時上海計有南開、復旦等公私立大學院校十所。我往返廣州、上海之間作多次穿梭協調，盡量安撫學生的情緒。

㈤召開教育行政檢討會議：

三十八年九月，教育部在廣州文明路教育部大禮堂召開教育行政檢討會議。出席人員包括西南地區大專學校校長，廣東、貴州等省市教育廳局長及教育部人員多人。會議內容係針對①配合戡亂國策、適應軍政需要；②加強訓導，整肅學風，積極輔助流亡學生，解決學校經費困難，以及一般教育設施等問題。

㈥請臺灣軍政當局設立行政專科學校：

上海失守後，北方大專學生湧向臺灣，面臨生活及學業困難，亟待安置。我向省府主席陳誠建議，設立大學一所，藉免這些學生失學。陳誠在軍事方面貢獻很大，三七五減租也辦得不錯，但是他根據過去在大陸對學潮的印象，對興辦大學有成見，爲了爭取設校一事，我與陳誠談了三次：第一次，陳誠回答我說：「不行！大陸丟了，都是你們大學搞的！」我回陳誠：「大

陸丟了，原因很多，不能說全是教育的責任。」第二次，再向陳誠爭取設校，他依然不允。我想，非想個法子取得省府同意不可，如果建校不成，這些流亡學生如何安置？遂邀請幾位前任教育部長，一起去見陳誠，希望陳誠應允建校事。那日，陳誠請我們吃飯，席間，我對陳誠說：「這次我一定要得到您的同意，否則無法安置這些流亡學生。您可以親自去看看，他們現在暫時被安置在七洋港。」這時，與我同往的王雪艇等人，都幫我講話。陳誠後來拍拍我的肩膀，對我說：「老弟！我答應你辦一所專科學校。」說畢，起身離座上洗手間。這時，王雪艇問我：「你同他是親戚嗎？他爲什麼喊你老弟呢？」我說：「不知道，你待會兒問問他。」陳誠回座後，王雪艇笑著問他：「辭修！你同立武兄是親戚嗎？」陳誠說：「不是。」王雪艇又問他：「你們既然不是親戚，你爲什麼喊他『老弟』呢？」陳誠說：「你們這些書生！我是丘八，他是丘九，他不是我老弟是什麼？」大家哄堂大笑。

建校案既經陳誠首肯，我進一步向陳誠商請省府撥款建校。陳誠說：「我准你辦校，已經是讓步了，省府哪有錢給你辦校？」我於是將教育部自重慶帶來的兩塊黃金取一塊給省府，充作建校經費，行政專科學校始順利成立。該校自成立以來，幾經擴充，現在已成爲國立中興大學的法商學院，培養了無數的人才，對臺灣的各項建設，極有貢獻。

㈦搶救古文物及反共學人：

1.搶救河南博物館古文物，參見第五章第二節。

2.專機運送西南學人來臺。

3.流亡學生萬人，組成自由青年戰鬪團。不幸大多淪陷匪區，少數人存活。

(八)幾所苦難中成長的學校：

1.長白師範學院：

國立長白師範學院在戰爭中，經過八遷，師生同甘共苦，歷經風霜，自東北鴨綠江略八家墟—撫順--瀋陽—北平—南嶽—廣州—海南島而渡海來臺。

2.山東八所聯合中學：

大陸淪陷前夕，數以萬計的山東青年，紛紛南下遠走，渡過黃河與長江，流散在浙、湘、贛等地。教育部爲撫輯這些流亡青年，商請山東省政府教育廳，分別在浙江杭州、海寧，江西貴溪等地，設立濟南第一、二、三、四、五共五所臨時中學，又在湖南衡山設立海岱聯中，安化設立煙臺聯中，衡山設立昌濰聯中等共計八校。三十八年四月，國共和談破裂後，共軍渡江南犯，八校師生輾轉抵達廣州。經山東省主席秦德純奔走，教育部與國防部、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等協商，決定接運他們來臺。教育部並決定支援二千名公費名額、一百五十名教育部職員的人事經費，由澎湖防衛司令部派輪艦分批接運他們到澎湖。爲安置這批流亡青年，特設澎湖防衛司令部子弟學校，解決他們的生活與學業問題。這些當年的山東青年，經過千錘百鍊，今皆卓然有成，如王

曾才（前臺大文學院長、今考試院秘書長）、朱炎（臺大文學院長）、王德毅（臺大教授）、張玉法（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陶英惠（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王國璋（中研院美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及某集團軍司令等。

3.豫衡聯中：

㈨設立教育部職員宿舍：

爲安置教育部職員的生活，我以低價向省府申購三十八棟房舍作爲教育部職員宿舍。我個人則一直是租房子住。一九五三年，我籌組華美協進社時，委請好友第一銀行董事長黃朝琴，代貸合適的房子。黃朝琴向我推薦位於今中山北路一段的一棟新建大厦中的三座房子。每間單價是十八萬元，那個時候，十八萬元不是小數目，我買不起。黃朝琴說可向他的銀行貸款，但我只承租了一座。當時如果全買下來，今天市價不知增值凡幾了。可是我對發財之事沒什麼興趣。民國六十一年，我自希臘返華後，也一直租房子住。一直到近幾年，才買下現在住的這棟公寓。這個房子，是向市銀貸款二百五十萬元買下的，目前還欠銀行二百萬元，尚未還清，我預定在二年內，還清餘款，不然，到現在連一棟房子還沒有實在不成話。說起來，這對內人也很不公平。可是我的個性就是不在乎錢。然而我並不鼓勵每個人都像我一樣。

我個人以爲，一個人若能藉著一己的能力與智慧服務社會，並在工作中得以發展他的個性與才能才是最重要的。至於工作本身帶來的其他附屬品，並不重要，名與利都是次要的，並非一個

人做事的目標。因此我對金錢從不重視。抗戰時期，我擔任蔣先生與英國方面的聯絡人時，掛名軍委會參事，月薪定爲六百銀圓，這個數目，在當時是相當高的薪俸。然而我基於青年人的熱誠，拒絕接受這六百大洋。民二十八年，孔祥熙要我掛名貿易委員會委員，實際上幫他做事，月薪也是六百銀圓，我也拒絕了這份待遇優厚的工作。拒絕蔣先生給我的六百銀圓薪俸，可能多少給蔣先生一種印象，也許他認爲我這個人個性強。民國五十五年，我自菲律賓返臺參加國民黨九屆三中全會（三月七日—十日）時，張羣秘書長曾向我表示，蔣先生有意請我出任外交部長，要我預作心理準備。過幾日我應召見蔣先生前，張羣密知我，已另定魏道明出任外長，當時反而覺得輕鬆。

㈩協助政大學生來臺：

我原先計畫將政大遷校來臺，但因經費無著，兼又考慮到交通運輸困難，遂與該校教務長楊希震商量將數百名政大學生編成軍隊，隨國軍轉海南島來臺，後來到了海南島後，眞參加作戰，甚至打游擊，輾轉來臺，奠定了早日復校的基礎。可惜在作戰時，竟有少數光榮的犧牲了性命。

㈪成立國立編譯館：

蔣先生對我籌組國立編譯館的計畫，很表贊同。他問我：「你打算請誰出任館長呢？」我向蔣先生報告說，計畫請梁實秋出任館長。蔣先生問我：「他是本黨黨員嗎？」其實蔣先生明知梁實秋不是黨員，卻特意問我這個問題，我對蔣先生說：「梁實

秋不是黨員，他是反黨人士，我國目前處於非常時期，需要集合各方面的人才爲國家効力。」蔣先生聽後，不置可否，此事也就無疾而終了。

我供職教育部幾年，對行政院會議有很深的感觸，認爲行政院需要一個智囊團爲重要施政的政策和內容提供研析的資料，以利與會人士共同參與討論，作出決定。

回想歷任行政院長主持行政院會議的情形：孔祥熙很喜歡在院會上說故事，他說話的時間佔了會議時間的極大部分。宋子文，每次主持院會，時間很少超過一小時，部會提案報告完畢後，主席卽做決定，很快卽散會。張羣與何應欽，則將所有的議案，在院會中提出討論決議，他們兩位的態度十分雍容。閻百川也主持得很謙和。

第七章　擔任總統府顧問

一、處理兩航事件

在教育部長任內，我曾奉命處理兩航事件。民三十八年十一月九日，由政府支持的中國航空和中央航空兩公司總經理由港飛滬投共。兩航空公司的七十餘架民航機停泊香港。這批飛機如果落入共黨之手，在其侵略臺灣之企圖上，可能發生極大的威脅。當時行政院開院會時，因爲交通部長滯港，且意志動搖，遂授權我處理此事。我當卽安排將飛機售予陳納德將軍之民航隊，該公司以重金聘請著名的英國律師在香港法庭申請取得所有兩航之飛機。經一再審訊，結果法院承認以我所簽署之出售文件，將飛機及有關財產，判歸陳納德的民航隊。

二、董理救助中國流亡知識分子

民國四十年迄四十五年，我擔任總統府顧問。這是一項名譽職，使我能够同時兼任「援助流亡中國知識分子協會」中國董事

會主席，以及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臺中區主任，暨基督教大學（東海大學）籌備處主任。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後，不少高級知識分子流亡香港。他們在港舉目無親，生活困頓，美國眾議員周以德爲協助這些人才，在美國發起「援助流亡中國知識分子協會」從事救濟流亡中國知識分子，先在紐約成立總會，募集經費，繼在香港設立分會，辦理登記，凡受過大學教育兩年以上者爲合格知識分子。迄民國四十一年，合格者數千人，亟須向其他地區介紹就業。周以德於是決定在臺成立董事會，請我擔任董事會主任，並聘費吳生爲副主任。我們立即規劃接待難民來臺，積極安置他們就業，並在臺北近郊建立「以德新村」，安置來臺知識分子。

這些流亡知識分子來臺經過，十分曲折，因我情治單位對這些知識分子有意見，以致兩度來臺不成。幸得陳誠之協助，始得順利進行。陳誠曾爲此當我面打電話給當時的安全單位首長說：「如再不讓這批人來臺，我這個行政院長不幹了！」情治單位始決定放行。但是，問題發生了。頭批流亡知識分子來臺後第四日，有人向陳誠報告：「總統府對面的小公園內發現『打倒蔣介石』等反動標語，是這批來臺流亡知識分子懸掛的。」我對陳誠說：「誰看得出來這些標語是誰寫的？我不相信是他們寫的。」

接濟來臺的這批知識分子，共一萬三千五百人，有教授、有工程師、有會計師、有技師及新聞記者等，可以說都是社會國家

的中堅分子，焉至出此幼稚之舉？

三、籌辦東海大學

民國四十年，美國紐約教會聯合董事會若干人士前來臺灣訪問，咸認臺灣應設立一所新的教會大學，以爲大陸十三所教會大學（卽金陵、金陵女大、華西協合、華中、之江、聖約翰、齊魯、燕京、嶺南、東吳、滬江、華南、福建協和等十三校。）之延續。但因我政府遷臺未久，各項政策有待重新釐訂者甚多，新設大專學校及擬在臺復校者，一律均從緩議。迨至民國四十二年，經有關人士奔走洽商，始露開放設校曙光。

六月十一日，美國紐約教會聯合董事會派美國奧柏林學院前神學院院長葛蘭翰博士 (Dr. Thomas W. Graham) 爲代表，偕該會執行秘書芳威廉博士 (Dr. William P. Fenn) 抵達臺北，與我接觸，討論籌備建校與籌組董事會事宜。六月中旬，正式成立基督教大學籌備處，我擔任籌備處主任，葛蘭翰、蔡一謀、蔡培火、黃彰輝、誠恩慈，美籍狄卜賽夫人 (Mrs. C. de Beausset)、英籍安德森 (B. Anderson) 及加籍明有德博士 (Dr. Hugh MacMillan) 等爲委員。籌備處卽設於臺北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七巷二號，我延聘了前教育部的秘書主任徐可熙擔任執行秘書，展開籌備工作。

關於設校地點，我巡察臺灣各地，認爲臺中市西屯一大塊土

地最爲適宜，經提出籌備會議，一致認可。並定校名爲東海大學，這名字亦是我建議的。緣我察勘校址時，遙望就在東海之東，所以立刻想以海東爲校名，後來和羅家倫商量，他說不如仍以東海爲宜。是年洽逢美國副總統尼克森來華訪問，於是就請他於十一月十一日爲新設大學舉行破土典禮。四十四年秋，正式開學，篳路藍縷，備極艱辛。至於校長人選幾經斟酌，最後選請曾約農爲首任校長。

第八章　折衝樽俎，服務僑社

一、駐泰國大使

我在教育部長任內某年，王世杰曾經向我表示，陳誠表示要我續任。但在此同時，張厲生卻密告我教部已另有人選。我遂將教育部業務預作交代。嗣後人事命令發表，果然如張所言，另有其他人選。後來陳誠雖在民國四十五年，提名我出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我以非閩籍、客籍、粵籍人士，不易推動僑務工作爲由，婉辭之。不久，外長葉公超提名我與另兩名候選人，出任駐泰大使。八月，總統頒令，任命我爲中華民國駐泰國大使。我於九月三日在總統府紀念月會宣誓就職後，於九月中旬，啟程就任新職。

赴泰前夕，情報局長鄭介民叮囑我赴泰後，多與泰國警察總監乃砲（Gen. Phao）聯繫。（泰語「乃」爲「先生」之意）我赴泰後，即面見乃砲，然而乃砲人心不在焉，給了我很不好的印象。後來我知悉他與大陸方面有貿易往來。

泰國陸軍總司令乃沙立則爲我心目中可交之人物。原先他邀

請我每隔一週與他共論時事，兩個月後，增加爲每週至少一次。我知道乃沙立對泰國政局抱有理想。果然，一年多以後，有一日，他突然向我表示：「杭大使，下星期你不要來了，不知道以後我們還能不能見面？」當下我立即明白，乃沙立即將發動政變。過幾日，乃沙立果然發動政變，政變成功，驅走了國務總理。乃沙立出任國務總理後，我邀請他來華訪問，他向我表示：「我的身體不好，不適於出國訪問，何不邀請乃他儂 (Gen. Thanom) 訪問貴國？我計劃請他擔任下一任國務總理。」民五十八年，蔣經國先生訪問泰國，曾拜會當時的泰國國務總理乃他儂，因有這段因緣，去年一月，蔣經國先生去世，代表泰國政府來華弔唁者即爲乃他儂。

我與乃沙立的友誼頗深。茲舉二例，可以充分說明我們之間深厚的友情。乃沙立對他手下兩名大將乃巴博 (Gen. Prapas) 與乃他儂相互競爭深感憂慮，我向乃沙立建議：「你可以將他們結爲兒女親家！」乃沙立連聲讚好。結果，乃巴博的女兒嫁給乃他儂的兒子。兩家結爲親家後，果然不再有暗鬪情事發生了。乃沙立也曾因接受我的意見，而解決了泰寮邊境糾紛。一九六二年，泰寮兩國發生邊界爭執，案由國際法庭審理。當時顧維鈞先生是國際法庭法官，我去電請他幫忙。顧氏回電稱，泰國政府會輸了這個案子。我將顧氏的回電轉給乃沙立及泰國政府聘請處理本案的律師。該名律師很自負，對這個案子認爲有把握，連連表示：「不會輸！不會輸！」結果，國際法庭在審理該案後，判定

寮國政府勝訴。泰國國務院就國際法庭的宣判進行商議，內務部長與外長互相推諉責任，乃沙立感到困擾，不知究竟是否應該接受國際法庭對本案的裁決？一日，我以駐泰國外交使節團團長的身分赴機場迎送貴賓時，遇見乃沙立，向他問安。他回答說：「每天都在那兒談！談！談！談不出個結論來！（指泰寮邊境糾紛）眞令人頭痛！」我對乃沙立說：「沙立元帥，這件事很容易解決！」他不解地望著我。我接著說道：「寮國邊界地勢陡峭，無路通行。寮國如何能不經泰國境內的山路上山？」沙立聽了，喃喃重覆我的話說：「寮國如何能不經泰國境內的山路上山？寮國如何能不經泰國境內的山路上山？」頓時明白我的語意。隨卽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接受國際法庭的裁決，同時封閉泰國境內通往山頂的道路。如此一來，寮國人根本無法上山。從以上兩件事也可以看出，一個外交官可以影響友邦政府的決策，此端賴他與友邦政府的關係如何。

民國五十二年，我邀請泰王來華訪問，他欣然接受，遂偕皇后及首長訪華數日。我政府爲表示竭誠歡迎之意，特地興建了現在圓山飯店的麒麟廳。泰王非常尊敬蔣先生，他與老先生談話時，每用晚輩語句，而視蔣先生爲叔伯。中共方面近年來也曾經邀請泰王訪問，泰王本人均未接受，改派公子前往，同時請他的姊姊來華訪問，以示友好。前年泰王過六十歲生日，我赴泰祝壽，他特別向旁人介紹我說：「他與我是好朋友，希望共同爲增進中泰實質關係而努力！」當時，他提了數項增進中泰關係的農

業等各項方案，我於返臺後，向有關單位反映，希望我們能够與之合作。

民五十三年，泰國華僑捐資購地，擬興建介壽堂作爲蔣先生六十壽誕之賀禮。但是因爲種種原因，多年來，一直無法順利展開興建工程。在這段期間內，四百名華僑貧民遷入工地棲身。如何安置這些貧民，是一項很棘手的問題。稍一不當，可能引發事端。經過縝密籌劃，疏導協調，我決定出售二分之一的建地，以所得款項，補助佔住建地的貧戶每家二萬泰幣。介壽堂遂得以順利動工興建。後來在這一大片土地上，除蓋了介壽堂外，並建造了大使館、館長官邸和職員宿舍。整個館舍，煥然改觀。新建駐泰使館落成後，篤信風水的泰國人士警告我說，最好改變一下旗桿的位置，否則將危及我個人的生命安全。我未加理會。一年多後，我調任駐菲律賓大使，繼任駐泰國大使劉馭萬到任未及一年，即因病去世。泰人咸認劉大使之死因，與使館旗桿位置不當，破壞了風水有關。我個人並不反對談相論命這類事情，但認爲只能作爲參考，卻不能完全加以信賴。

二、兼駐寮國大使

民國五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我奉命兼任駐寮國大使。次年，寮國政府計劃與中共建交前夕，寮國軍方向我表示，希望我在寮國與中共建交後，仍繼續我原有的職務。我電詢外交部的意見，

外交部回電，要我在寮國政府正式承認中共政權後，即刻離開寮國。我再電請蔣先生核示，蔣先生將電文轉給外交部處理，外交部仍維持原議。然而，爲了使僑胞安心，寮、共建交後，我並沒有立刻離開永珍，我留在那兒安頓僑社並在泰寮邊境成立了一個辦事處，繼續爲寮國僑胞提供服務。有時將在外，應有若干伸縮的餘地。

過去，盟邦與中共建交後，我外交部立即下令駐該國外交人員撤離該國的作法，是值得研究的。不但失卻僑胞的向心力，同時自囿於外交孤立。在經過多年的困難後，有關單位已經改變作法了。由此可以看出，我們有很多事情都是這樣，非經過一個痛苦的階段，遭遇許多挫折後，不會改弦更張。

三、駐菲國大使

㈠成立防火會

民國五十二年，陳誠代表蔣總統訪問菲律賓後，有感於中菲兩國間幾項問題懸留多年未解決，決定調我出任駐菲國大使。

時值菲人排華最烈時期。有一次，馬尼拉市區發生大火，菲人藉口華人縱火，醞釀將華人自市區完全逐出。當時，根據菲國法律，債務人若遭火災意外災害損失，所有積欠債務人的債務，自然取消。同時，如果在意外發生之前已經投保，更可以領取相當數額的保險金。部分不肖的經商失敗者，遂出此下策，暗中縱

火，以獲取利益。這些縱火者，其中部分是中國人。我鑒於事態之嚴重，必須加以澄清，遂成立防火會。一方面防止火災，一方面追查禍首。收效頗大。

最初，菲人認爲這是華人的掩飾行動，馬尼拉時報的社論亦批評我是在作姿態。後因有一次某地失火，經防火會查出火首兩名確是華人，並送交法院懲處，防火會的信用由此建立。各大城市也先後成立防火會，菲國的消防局並願和他們密切合作，甚至有若干城市的居民，遇著火災，寧願華僑防火會去救災。

㈡解決逾期遊客與廢止僑校問題

一九四七至五二年五年之間，二千餘名中國人以遊歷省親的「非移民」資格，逃難到菲律賓，另有千餘名以學生資格入境。通常遊客入境，移民局批准居留期限爲六個月。超過六個月的居留，則由移民局長酌情決定。這批遊客，獲准超過一年的居留期限。但是在一九五〇年三月，菲國移民局忽又改變政策，禁止這批遊客延展居留期限，並採取遣配程序下令拘捕或遣配。菲國司法部長兼代理移民專員敏遜而進一步執行禁止華人入境之嚴厲政策。一九五四年菲總統復根據移民法以及內閣新訂立的政策，確立任何外國人以臨時遊客身分來菲者，除非有疾病或其他不能控制之原因，其居留期間不得超過一年。經過我國政府之交涉，菲國移民局允准華僑繼續居留，但是規定逾期遊客每人應繳納保證金。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國駐菲大使陳之邁與菲國外

長西蘭洛簽定陳西協定，解決逾期遊客問題，卻遭菲國參議院的反對。接著又有一九五九年段（段茂瀾大使）西（西蘭洛外長）談判，並簽妥中菲遣僑協定、遣僑協議備忘錄等，但皆未澈底解決逾期遊客問題。我於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接任後，經與馬可仕溝通，一再磋商，始於民國五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與菲國外長羅慕斯（Ramos）簽定 Ramos-Han 協定，澈底解決懸宕多年的逾期遊客問題。雖然這協定的執行，曾發生波折，直到一九七三年才完全達成，並付諸實施，但大體上，就此解決了。

㈢協助馬可仕競選菲國總統

民國五十四年，是菲國總統大選年。當時在任的菲國總統馬嘉柏臬穩重有餘，馭下乏力，因之人心思變。同時我因希望解決逾期遊客等問題，認爲馬可仕較有魄力，遂決定暗中助陣。特地引薦他到臺北晉見蔣先生。並且在菲國華僑社會中，發動捐款，協助馬可仕競選。當年他的經濟情況並不好，我親眼看見馬可仕夫人到我介紹的僑領家中拿錢。爲了競選，每天至少要供應幾十人在家裏吃飯，需要七、八百披索。爲了避免旁人竊聽有關競選事，那時我與馬可仕夫人以電話聯繫時，彼此以 William 與 Anna 相稱。馬可仕當選總統後，慶功宴上只邀請了我和日本兩位駐菲的外國大使。

㈣菲國副總統訪華

羅慕斯訪華期間，就我國農耕隊協助菲國農業生產事，與我政府達成協議。原來菲國的農產品必須仰賴國外進口，無法自足。我向菲國政府建議，由我國派農耕隊前往協助，保證在三年後，菲國農業生產可以自足。菲律賓人民其實是很聰明能幹的，經過我農耕隊的協助，三年後，菲國農產品不但可以自足，更可以外銷，可惜菲律賓人缺乏積極求進的精神，過了七、八年，菲國的農業生產，再度陷入困境。

㈤建贈中國公園

在菲律賓廣大的國家公園內，闢地建造中國公園，這本來是我到任後馬嘉柏皋夫人向我提商的。我立刻承諾，並向國內徵求圖案，募集材料，又在菲國僑社發動捐款一百多萬披索，花了大半年時間，建成一座美麗堂皇的中國公園。有牌坊式的大門、有九曲橋、有池塘、有假山、有亭臺、有迴廊、有殿堂。落成後，我請新任馬可仕總統剪彩，並將這座公園贈送給菲國家公園，成爲菲國人遊覽的勝地。

㈥促進中菲友誼與加强僑界團結

爲增進中菲兩國關係，我與馬可仕商訂一九六六年爲中菲友誼年，舉辦一聯串活動，以促進兩國人民與政府間之情誼。我另一項重要工作爲團結僑界力量。我每週邀請僑界領袖們到使館聚會，經常會談，增進彼此的了解與僑胞相互間的情誼，從而加強

僑界之和諧與合作。

㈦震　　災

民國五十七年八月二日，菲律賓發生大地震，帶給菲國人民以及僑胞三十年來最大的災禍。死亡三百餘人，受傷更不計其數。地震發生後，我立即組織賑災委員會，全力搶救倖存者。七日後，救難人員還在成堆的瓦礫中，救出一名男孩。又一、二日後，當救難人員準備放棄救援行動時，我請他們再繼續搜索，結果竟又搶救出兩名女性，她們在肉體遭受極大的痛苦之下，靠著強烈的求生意志，尚存一絲餘息。我立即派人將她們送往醫院急救，這在當時被認爲奇蹟。

㈧離　　職

爲解決逾期遊客問題，我曾經邀請馬可仕總統來華訪問。馬可仕雖然答應訪華，卻始終不訂下訪華的確定日期。我問他要日期，他居然說：「你替我訂個日子就行了！」有一次，魏道明部長訪菲，當談及馬可仕訪華事，知道馬可仕曾這樣說，便眞的要我替馬可仕訂下訪臺日期，我未理會，我後來對魏道明說：「你不明瞭馬可仕的個性，他說話是靠不住的。」後來有一次，我出席馬可仕在總統府舉行的國宴時，再請他決定來訪日期。馬可仕見我的態度很誠懇，順手拿出記事本，選了一個日子。我立即請在場的菲國外長作證。隨即呈報外交部，籌備馬可仕訪華事宜。

不料，就在馬可仕預定來訪的前三天，總統府突然來電話稱：馬可仕總統夫人生病，總統不能如期訪華。我向馬可仕總統說：「您身體很好，您一個人去也可以！」馬可仕說：「不行！我要等夫人病癒！」我知道這其實是一個藉口，馬可仕的手下有很多是左傾分子，不贊成馬可仕訪華。沒有辦法，我只好將情況呈報外交部。老先生知道了這件事，很不高興。從來沒有貴賓在接受他的邀請函後，卻失信取消訪問計劃的。這件事發生以後，老先生在舉行中常會時，要嚴家淦先生將我調離菲國。嚴先生雖然不甚了解老先生的意思，但也只得遵令知會外交部照辦。菲國僑界聞訊後，紛紛電我有關單位，請求晉見老先生，希望留任杭大使。結果，老先生並未接見菲僑代表。事後，一位在中央黨部服務的朋友對我說：「老先生當時說不接見這些僑胞代表，因爲對他們挽留你的要求，將無言以對，索性不見。經與外交部商議，老先生決定調你出任駐希臘大使，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首席代表。」

㈨協助艾奎諾

馬可仕和夫人雖對我具有友誼，可是我觀察馬可仕夫婦的作風，很爲未來擔憂，因此乃和反對黨艾奎諾接近，希望反對黨——菲國國民黨——能够將來起而代之。艾奎諾是一位青年才俊。記得當時他要當選爲黨主席之前，他和我商量如何安排較他資望高的前總統馬嘉柏皋。我向他建議，設名譽主席一職來安置

他。艾接受了。此後艾、馬相處甚好。可是馬可仕對艾不能相容，藉故將艾拘捕入獄。艾出獄後，赴美就醫，我去美時常與他接觸。

一九八二年我在羅安琪午宴艾奎諾和他夫人，我勸他回菲，否則菲人會逐漸淡忘他，並且馬可仕的霸權會造成不可收拾的混亂。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日下午我在家中看報，忽然收到圓山飯店送來他的密函，說他到了臺北急於見我。他面請我幫忙持假名的護照搭上華航飛機去馬尼拉。我問他到馬尼拉機場後他的安全有無把握。他說屆時將有數百人到機場歡迎。不過我還是警告他馬可仕的手段毒辣。當他到機場時，馬上有三個人上來架著他下去，並且在下機時，有一人用槍擊中他，倒地而死。當我見到這消息時，我很傷感，但想起菲國國父黎剎的話：因我的死而使國家得生，何樂如之！因艾奎諾的死而使他夫人——一個家庭主婦，但多年陪伴他作政治抗爭的貴婦——奮起革命，終於在一九八五年馬可仕欽定的大選獲勝，而在所謂「人民戰爭」中由馬可仕的叛軍擁入總統府。次年，我去見她並將他丈夫的最後親筆信送給她，祝福她成功。

四、駐希臘大使

民國五十七年七月，我繼溫源寧大使出任駐希大使的命令發表。我因希臘爲文明古國，曾在任內舉辦了中華文物特展。老

附件：艾奎諾先生來函

CONFIDENTIAL

Aug 20/83

Hon HAN Li Wu

personal

Excellency

I just arrived in Taipeh and our mutual friend Mr. Lien is out of town. An EMERGENCY has arisen and I have to talk to you immediately. Can you please spare me a few minutes of your precious time. I'm sorry to impose on you on a weekend but it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hat I see you.

Sincerely yours

Benigno S. Aquino Jr.

Center for Int'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1737 Cambridge St
Cambridge Ma 02138
(617) 495-2109

先生久盼在日本舉行展覽，駐日使館始終未辦，但竟然在希臘辦了，所以對這事頗有感慨。實際上，在希臘展覽的，乃是故宮文物複製品，其中少數珍品，乃是向個人收藏家暫借的，可惜行政院未向蔣先生說明。

希臘人向來以希臘文化與希臘佳餚自豪。我到任時，希臘還沒有中國餐館。在我的鼓勵下，僑胞先後開了兩家中國餐館，很得希臘人的喜愛，生意興隆。不久，又陸續有十幾家中國餐館開張。

希臘當時的總理與我關係很好，那時歐美國家的駐希大使，以希臘總理係軍人出身，不大同他交往。所以我與他交往，他很高興。希臘政府計劃與中共建交前夕，有一次，他問我：「希臘政府承認中共政權以後，如果貴國願意表示，貴國的主權僅限臺灣地區，也許希臘政府可以考慮繼續承認中華民國。」我認爲這不過是希臘總理的好意。我當時說，如果希臘外交部給我照會說「希臘政府繼續承認中華民國，但認爲中華民國的實際主權只在臺灣，我可以向外交部建議不回文反駁。」我遂將與希臘總理的談話電話外交部。未料，美國駐希臘大使聞訊，電美國務院，國務院要美國駐華大使詢問此事究竟。同時，美國駐希臘大使亦向我當面詢問。那知外交部立予美方否定的答案。並且打電報給我，要我趕緊對希臘總理表明態度，不能承認有兩個中國。過兩天，我晉見希臘總理，他不等我開口，就說：「我將此事交外交部研商的結果，抱歉，我國只能承認一個中國。」我也不便再說

下去了。翌年，聯合國允許中共入會，我國正式退出聯合國，此在國際事務與外交上，自不免帶來若干困擾。我有時想，如果當時能彈性地處理這類問題，也許不至有後來在外交方面陷於孤立的困境。

民國六十一年，希臘正式承認中共，我國與希臘國交中斷。按國際慣例，地主國對斷交後的原任大使，行前是沒有什麼表示的。但這次希臘政府竟打破舊例，由國務院總理親自將勛章贈我，外交部長並設宴餞別，由副總理及各部會首長作陪，這是史無前例的。

第九章　擔任國關研究所主任

民國六十一年，我自希臘卸職返國前一年，蔣經國先生曾經來函，希望我回國任職。我返國後，遂出任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我於接事後，向蔣經國先生建議，擬羅致海內外碩彥，成立外交、經濟委員會，以研究和討論的成果，供他作爲決策參考。經國先生欣然接受，並將委員會分別定名爲經濟小組和外交小組。

經濟小組成員包括劉大中、蔣碩傑、郭婉容、王作榮、李登輝、孫震等人。每兩週提建議案送行政院作爲決策參考。因蔣院長注意力在財經方面，他對這方面的建議，經常欣然接受，有時還要我親自送去同他討論。兩年多後，他曾向我表示採納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建議。

外交小組成員包括端木愷、連戰、周書楷、王紀五等人。時因蔣經國先生專注於臺灣經濟的發展，對外交視爲次要，所以外交小組所提的建議多半轉交外交部採酌，實際上遭擱置的居多。例如小組鑑於歷年來我國對聯合國之經濟議案未予注意，以致喪失若干的權益，建議我外交部次長中，應有一經濟專家。此案雖獲蔣經國先生之贊同，卻被外交部以「人才難覓」爲詞而予以擱

置。十多年後，始有一位經濟專才出任次長。嗣後，又再度擱置。但亦有少數的建議案獲得蔣先生立時採納者，其中之一是有關我國是否製造原子彈問題。民國六十二年，美國政府發言人說，假如臺灣製造原子彈，美國政府將立刻停止供售臺灣原子爐所需原料。外交小組經過研析，認爲臺灣幅員狹窄，沒有適當的地點可以試爆原子彈，也難以保密不使外國獲悉，故建議不製造原子彈。案經提出，立即獲得採納，三天後，蔣院長即公開宣佈，我國不生產原子彈，歡迎美國政府前來察查。

經濟、外交兩小組提出的建議案，雖獲中央採納，卻也引起各部會若干人員的不滿，以爲國際關係研究所干涉各部會的業務，屢次在行政院會議上抨擊國際關係研究所。最初，經國先生對這些批評並不在意，他認爲國際關係研究所的經濟、外交兩小組自成立以來，對國事建樹良多。但是爲了各部會的和諧相處，經國先生就向我表示不必再研討國內政經事務，而專心於大陸研究。我因此建議將國際關係研究所改隸政治大學。我也結束經濟、外交兩小組業務，辭卸研究所主任職。（註：民國六十四年七月國際關係研究所改隸政治大學，並改名爲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現代社會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國際事務也很複雜。政府的政、經、社會施政應有整體性的規劃，否則只是應付目前事務，所以我在我所服務的機構，例如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等，常有提案呈總統府，也常向政府倡議設立智囊團一類機構，作爲政府之

幕僚，但是不易實行。在中國行政機構中，個人主義、本位主義濃厚，門戶之見亦甚明顯，不容智囊團的存在，更談不到長期計畫，不無可惜。不過在經濟方面，近年來已有若干研究機構，能够逐漸發生智囊團的作用。同時，行政院的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亦近乎此。

第十章　推動反共與人權工作

一、出任亞盟秘書長

亞洲人民反共聯盟（簡稱「亞盟」）係蔣老先生與李承晚兩人早在民國三十八年倡議設立的，於四十三年六月正式在韓國鎭海成立。民國六十四年，因越南淪陷，遂將原設於西貢的亞盟秘書處遷來臺北，並一致推選我爲秘書長。我當時未卽接受，並建議由日本承辦亞盟秘書處業務爲更適當。日本方面經過八個月的考慮，鑑於與中共的外交關係而拒絕承辦。那年，適逢國際關係研究所改制，我已自公職退休，遂承乏亞盟秘書處責任，但聲明不支美金壹仟元的月薪。

亞盟秘書處於六十五年三月在臺北恢復辦公。其主要業務如下：

一、聯絡各會員國以促進亞洲人民之反共活動；並隨時與亞洲新興國家聯繫，爭取其加入亞盟運動；另外並聯絡、協調其他各洲相同性質之組織與反共領導人士，以加強反共力量。

二、召開亞盟理事會、執行委員會及大會。

三、舉辦各項研討會與座談會，推廣反共思想，加強並建立與世界各自由國家間之共同認識。

四、出版「英文亞洲月刊」、「英文亞洲與世界專刊」、「英文現代亞洲研究專刊」、「亞盟英文會務通訊」、「亞盟大會及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等反共刊物。

二、成立中國人權協會

近代中國成立的第一個民權組織，是由蔡元培等發起，在民國二十一年成立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當時一般人尚不關注「人權」問題，但國內若干知識分子已受民權號召而以「民權」爲會名。蔡元培與我是忘年交，國府在南京成立後，蔡元培計畫成立中央博物館、圖書館，曾向「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請款補助，當時我是該會總幹事，受楊杏佛之託，替蔡元培填具中英文本的申請書，並提請董事會議通過蔡元培的申請案，因此結識蔡元培。蔡元培在上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後，寫信要我在南京成立分會。這使我感到很爲難。根據我的觀察，當時一般人一心所想，是如何抗日，還沒十分注意到「人權」問題；同時，我剛在一九三一年接任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業務繁忙，分身乏術，無法再兼任他職，就去函辭謝了。如今看來，元培先生不愧是一位有理想、有遠見的人。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幹事楊杏佛在上海十分活躍。民國

二十二年，楊杏佛在上海遭暗殺身亡。如果當年我應蔡元培之邀，在南京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分會，雖然我的作風會與楊杏佛不同，但是依然也可能成爲一個目標。

我雖然辭卻該職，然而長久以來，我一直肯定有成立人權組織之必要。尤其自美國卡特總統，一面高唱人權，並且將之視爲主要外交政策目標之一，一面在執行上卻採取雙重標準。他對非共國家的人權大肆批評，卻漠視共產國家的人權問題，令人憤慨。所以，爲使世人瞭解中共對人權之忽視及加速推動我國民權運動，因而我在民國六十九年成立中國人權協會。並在七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在臺中成立臺灣省分會，七十七年三月五日，在高雄成立高雄分會。人權協會成立之初，偏重於揭發大陸對人權的迫害。但自高雄事件、王迎先命案發生後，便將主要注意力轉移至國內，協助政府推動自由與民主，以及人權之保障。

「中國人權協會」的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1.舉辦各項座談會、研討會：年來已經舉辦的座談或研討包括有關安樂死問題、臺灣地區人權調查研究、臺灣地區法律服務、經濟犯罪、法治與社會風氣等。近來則以「人權與法治」、煤礦工業與礦工權益爲主題，討論有關特權、貪污犯假釋、原住民人權、殘障同胞人權、婦女、兒童、勞工權益及器官移植等種種涉及人民權益之問題。

2.舉辦國際會議：例如民國七十年九月在關島與英國「國際研究中心」和「關島自由人權協會」聯合舉辦「國際人權會

議」，探討共黨及非共黨國家之人權問題。有英、美、比、荷、德等十二個國家、地區之代表參加。會後並出版英文論文集。民國七十三年九月，在臺北召開「亞太地區法律服務研討會」，來自美、澳、紐、日、韓等十二國專家與國內法界學者數十人與會，共同研討法律服務有關問題。

3.與國際人權組織及人士聯繫：本會經常與倫敦國際特赦組織、紐約國際人權聯盟、華盛頓國際人權聯絡網、雪梨亞洲法學會等通信聯繫，並曾協助國際特赦組織與國際人權聯盟之代表旁聽高雄事件審判及訪問綠島監獄。並派代表出席有關國際會議和聯合國贊助之人權講習會。

4.調查研究臺灣地區人權狀況：民國七十年本會委託東海大學、政治大學、師範大學及中興大學調查研究臺灣地區之政治、經濟、文教及社會人權狀況和國人之滿意程度。嗣後刊出中英文版調查研究報告。七十三年委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進行「臺灣土著的傳統社會文化與人權現況」調查。

5.成立法律服務處：受理民眾基本人權可能受侵害之案件。民國七十一年有計程車司機王迎先受警方誤認殺人，以致跳水自殺案，經本會法律服務處向法院依法控訴，五位警官分別被判處刑。我復出面邀約被判刑的警官與王氏家屬洽談賠償損失，這個案子得以圓滿結束。另一件張銘傳被法院根據證人說詞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案，亦經人權協會和律師的聲援而昭雪。該案雖經過九次覆審而至今尚未結束，但至少已有迫使法院判案更加

審愼的效果。兩個引起社會注視的案件，奠定了人權協會法律服務的良好基礎。最近聘請了一百多名榮譽律師在警局輪流服務，更有助於公權力的提昇。

6.探視監獄受刑人：自民國六十九年十月起，多次探視新店警總軍法處看守所、土城仁愛教育實驗所、臺北監獄、臺北看守所、臺中監獄、臺南監獄、綠島監獄、新竹少年監獄等一般受刑人和高雄事件受刑人。並對監獄管理措施及環境，提出興革建議，請主管機關研究改進。

7.支援大陸同胞爭取自由人權：本會經常以座談會、函電、投書、刊登廣告等方式呼籲國內外人士重視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並協助中國大陸留學生、學人及中共駐外人員之投奔自由。最近，並擬派團到大陸與知識界人士接觸聯繫，以推動人權思想與運動。

8.關懷國內人權狀況：①經本會之努力，促使吳約明等二十二名服刑三十年以上之叛亂犯於民國七十二年、七十三年分別獲得假釋出獄。高俊明、林義雄、呂秀蓮及陳菊等高雄事件服刑人也分別在一、兩年內獲准假釋或保外就醫。②陳文成案和秘雕案等，本會均曾與有關機關聯繫，務求所作處理能兼顧人權及法治。③民國七十四年元月與臺北市立美術館聯合主辦殘障同胞創作展演會，鼓勵殘障同胞肯定自我，藉以喚起大眾對殘障同胞應享有的人權之共識。④就政府制訂或修訂的「選舉罷免法」、「刑事訴訟法」、「檢肅流氓條例」及「勞動基準法」等召開座

談會，邀請學者專家發表意見，並將結論轉送中央選舉委員會、立法院、司法院等有關單位，以爲立法之參考。

9.推展法治觀念：爲改善社會不良風氣，培養守法觀念，強化民主法治建設，人權協會在七十一年六月至八月間與「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及中央日報聯合舉辦推行守法風紀座談會與徵文比賽。

10.救助泰境華裔難民：人權協會於民國六十九年四月，聯合中國紅十字會、扶輪社、獅子會及中國佛教會等民間團體組成「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選拔優秀社會青年或大專學生擔任志願義務工作人員，派赴泰國服務華裔難民，每一梯次爲期三個月。

11.出版報導本會活動及國內外人權消息的「人權會訊」（每三個月一期）；發行有關選舉問題、婦女人權、特權與人權、殘障同胞人權、中國大陸人權運動等研討會專册；與「三十年來之人權發展」、「中國文化與人權思想」、「越南難民問題」、「人權法典」等專書。

12.推動「香港人民之友」運動：香港在經貿方面爲亞洲所謂四小龍之一。考其所以如此繁榮，主要在英國統治下，政治安定，生活自在，但一九九七年香港即將由英國歸還中國大陸。在中共統治下，雖然依照「中英協定」，中共承諾賦予港人「五十年不變的政制與自由」，可是根據大陸三十多年來的動亂，誰能不替港人未來擔憂呢？鑒於若干資金開始轉移至澳洲、美、加等

國，我乃於一九八五年五月發表「一九九七年，其前十二年及後五十年」一文，並由美眾議員奎恩提案將此文列入美國會五月二十二日紀錄。我表示希望香港居民應該自助爭取大陸履行諾言，並呼籲自由世界人士，注意香港的未來，支持港人自助行動，藉以加重對中共的壓力。

爲達成這項目的，我乃發起「支援香港居民之友」運動，並赴倫敦、紐約、華盛頓等地推動，最後，於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在臺成立委員會，並聯繫各地同性質的組織。在倫敦成立的「香港居民之友英國委員會」，並對外發行「香港瞭望」季刊。其他陸續成立的有紐約「香港居民之友委員會」，溫哥華「香港人之友社」、「香港居民之友聯絡中心」，「香港居民之友雪梨分會」，華盛頓「香港居民之友協會」，加拿大「香港居民之友全國協調委員會」等。臺灣之委員會並在民國七十七年派訪問團到香港、澳門訪問，引起港澳人士熱烈的反應。

中國人權協會今後仍將以出版人權書刊、舉辦研討會、座談會、支援大陸同胞爭取人權、關心國內人權發展、加強與國外人權組織之聯繫以及推行法律服務等爲主要之工作，並促進臺灣人權之發展。

三、推動自由民主和平統一運動

民七十五年冬，我開始計畫推動「自由、民主、和平、統一

中國運動」。這是有鑒於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運動，雖在政府支持下大力展開，可是因爲西方人士不甚明瞭三民主義之精義，以致這個運動較難贏得西方人士之認同與支持。至於大陸方面，更喜用共產主義來抵制三民主義，因而覺得自由、民主、和平乃全世界人士追求的目標，如以此號召統一中國，較易獲得海峽兩岸大眾的支持與國際人士的同情。

不過，我也知道無論什麼有關政治的運動，要想得到全國的共識，不是容易的。例如部分人士曾擔憂「自由民主和平統一運動」會影響「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運動」的推展，因而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盼望我放慢腳步，慢慢來。嗣後中央黨部新任秘書長在美與僑界談話，竟發覺仍有若干學人對「自由、民主、和平、統一中國運動」表示支持。他返國後和我談及，我告訴他以往的經過。他聽了後，隨卽表示：「再研究！」我也就緩下來。可是所謂形勢不饒人，年來各方有識之士，在海外、在大陸、在本島，都響起這種呼聲。我乃於民國七十七年夏，趁幾位留美學人返國之便，在亞洲與世界社舉行大規模座談會，以「自由民主和平統一中國」爲主題。出席近百人，幾乎一致贊成此議。是年十月二十一日，旅美學人在北加州聖荷西市，乘參加「全美中國研究協會第三十屆年會」之便，成立自由民主和平統一中國促進會籌備會，並推舉冷紹烇爲會長，翟文伯爲執行秘書，我亦被推爲名譽會長。該會並於一九八八年正式成立，相信成立後之工作，應該可以逐步推動。

四、成立亞洲與世界社

民國六十五年，我在臺北發起成立亞洲與世界社（AWI），作爲政府部門、私人機構、學術機關的研究橋樑。在商業、管理、經濟、社會環境、商業協定、外交政策與國防事務方面，提供重要的諮詢服務。爲達成目標，亞洲與世界社研究世界現勢，協助召開國際與區域性會議，協助我國學者參加國外會議，並發行有關國際關係之刊物。亞洲與世界社自成立以來，提供私人公司、公家機關與政府部門有關一般資訊、政策分析之研究，已建立良好的聲望。

亞洲與世界社創辦之初，延請政大教授關中爲主任兼總編輯，嗣再增聘曹俊漢、邵玉銘爲副主任兼副總編輯。數年後，關中因任國民黨黨務工作，改聘邵玉銘爲主任兼總編輯。邵轉任新聞局長後，改聘陳明爲主任兼總編輯，並加聘朱志宏爲副主任兼副總編輯。另成立顧問委員會，聘關中爲主任，陳奇祿、邵玉銘、連戰、孫震、張京育、杜蘅之、宋楚瑜、章孝慈、王紀五等爲顧問。

亞洲與世界社是一個學術性、組織獨立的非營利性私人機構。其組織經費來自私人企業的捐款。該社平時就北美事務、亞太事務、歐洲事務、國際經濟事務等進行研究，研究成果提供各界作爲參考。亞洲與世界社的主要業務有：

1. 舉辦研討會及座談會：先後舉辦有關日、韓、澳、紐、東協、東北亞、美、歐等地區性研討會；及「美國對華政策」、「中美關係」、「中共研究」、「中韓關係」、「香港問題」等座談會。

2. 與國外學術機構合作召開國際性會議。如與法國南巴黎大學合作，在法國巴黎舉行「第三次歐亞研討會」；與美國加州大學、西德薩爾蘭大學、英國肯特大學在西德舉辦「三十年來中共研究檢討會議」；與西德慕尼黑大學合作在慕尼黑舉辦「國民政府與西方國家之關係研討會」；與美國太平洋社會研究所、韓國外務部、外交安保研究院在韓國漢城舉行「太平洋安全會議」等。

3. 出版中英文論文集、專刊、講演論文集與英文亞洲專刊等。

五、促進太平洋海上交通安全

因交通的便捷，世界距離縮短，國際合作，益趨重要，但合作談何容易，必須包括相互利益，才能達到眞正合作。經過若干次的國際學術會議，我偶爾發現一項問題，值得探討，而且可能取得國際合作，那便是海線交通的安全。況且臺灣四面環海，各項資源多仰賴進口，而進出口業務多賴海運維繫。尤其中美斷交之後，協防條約中止，更需西太平洋國家共同維護海上交通安全

與自由，於是透過亞洲與世界社，舉行一次座談會，強調海線交通研究的重要，並徵得美國前駐韓國聯合國軍司令史蒂威爾將軍的同意，請他分赴日、韓等國，洽請有力人士分別設立海線交通研究會。等到中韓日美四國會議，決定成立海線交通研究會後，嗣又有菲律賓、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澳洲、紐西蘭等國陸續加入，並在各該國輪流舉行研究會議，目前一共有十一個會員國。我國因與多數會員國沒有邦交，故出席本會之代表，以民間名義與會，實際是包括政府官員。其他國家亦復如是。

六、放眼未來

時代永遠前進，工作永無止境。我的潛在意識，推動我開闢新視野；事實的需要，也召喚我接受新挑戰。只要健康容許，我會不受年齡的限制，繼續努力，爲社會國家盡一分子的責任，爲自由民主和平均富的統一中國作爲一個前哨。

第十一章　談幾位聞人

一、陳立夫

我與陳立夫經常同時出席各項會議，我與他在教育部是先後任，是友人。陳立夫與陳果夫一般被認爲屬於黨的保守派，有一段時期與朱家驊派對立。大陸上若干學潮，有些是因爲這兩個派別對立衝突而發生的。我這個人則只知道做事，不搞派系。民國三十八年我出任教育部長時，分別聘請朱、陳兩個派別之中的人才各一位，擔任教育部次長。他們分別是吳士選與翟毅甫，大家相處很是和諧。

談到陳果夫，我和他有一段時期來往比較多些，那是他主持導淮委員會的時候。我那時任職中英庚款會，對於導淮事業，經常貸款資助。我覺得果夫很有見解，並且平易近人。後來他閒居臺中，臺中議會通過他爲臺中第三位榮譽市民。若干年後，我在臺中照料故宮文物並且創辦東海大學，臺中議會通過我爲第四位榮譽市民。

二、李國鼎

李國鼎是我擔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時，考選赴英公費留學生之一。當年他赴英攻讀物理學，學成返國後，轉任財經工作，甚有貢獻，最初他和尹仲容共事，仲容過世後，他顯示特立獨行的才華，外銷特區的制度，便是他計畫推動的，這對臺灣經濟的繁榮，很有助益。以他的能力，甚至可擔任到行政院長的職位，可惜由於當時的健康關係，他夫人力阻他擔任繁重的工作。

李夫人是金陵女大畢業的，和他都是基督徒，國鼎尤其熱心宗教。

三、李登輝

我擔任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時，曾聘李登輝先生爲經濟小組委員。該小組委員均是一時之選，而有關農村經濟方面的研究多是他負責計畫撰寫。他在大約三年的期間裏完成多篇的獻策，由我送達行政院蔣院長，多被採納，貢獻很大。

李先生的爲人與處世，頗有領袖羣倫的氣概。他也是基督徒，我們有時在教堂見面。在政治上，我欣見他的興起，並且企盼他在總統任內有卓越的成就。

四、連　戰

連戰的父親連震東與我是好朋友，我們在若干機構是同事，例如我們曾都是故宮博物院理事會常務理事，在開會時，我們常表達相同的意見，可惜他後來因健康不佳而休息，我與連戰遂成了兩代之交。因爲他學的也是政治，在一見之下，覺得他很有才氣，所以我們便成爲好朋友。我擔任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時，特別請他出任政治小組委員（當時他甫自國外學成返國），並請他擔任各項會議的總幹事或秘書長，讓他多有表現的機會與經歷。他因自己的才華，所以在政治上受到不次拔擢，由大使而行政院政務委員、交通部長、副院長等。我相信他在外長任內，會有若干突破性的作法和表現。

五、端木愷

端木愷與我是同鄉，我們多年經常在一塊兒。我擔任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時，曾請他擔任政治小組委員。他專攻法律，談鋒甚健，考究飲食。他曾擔任多項公職，展現他的政治長才。我們都和基督教會在中國大陸創辦的大學有深厚的關係。我在臺中創辦東海大學，是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資助的，本來希望東吳大學也參加，可是東吳終於單獨成立，他被推爲董事長，並擔任首

任校長。

六、蔡元培

蔡元培與我是忘年交，我與他很有緣。

我擔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後，曾在南京一家西餐廳宴請數十位貴賓，請帖上註明餐會時間是中午十二時正。那天，我遲到了五分鐘，剛走進餐廳，見蔡元培早已入座，使我印象十分深刻。以蔡元培的資歷，我原以爲他不會接受我的邀請，沒想到他不但接受邀約，而且準時出席。這令我深深地警覺到，不論公務如何繁忙，出席任何場合絕對要守時，不可遲到。

蔡元培先生之性格有其剛直的一面，茲舉一件小事爲例。記得某年的國父誕辰，首都南京中央各首長齊赴中山陵謁陵，數百級坡道皆步行拾級而上。蔡先生在途中與蔣先生擦肩而過，蔡先生竟掉頭他視，不打招呼，但當他發現我時，卻回頭向我表示，先前沒來得及招呼。使我感到蔡先生爲人之不趨附權勢，而看重友誼的剛直個性。事實上，他與蔣先生在政見上確有歧異，連招呼也不打，就表現得相當率眞了。

抗戰期間，他住在香港，中央研究院在港舉行院會，歷史語言研究所報告關於他們文物遷運西南時，我曾予以協助，他在會後親筆來函致謝，並讚揚我對故宮文物保存的努力。我後來因事赴港曾去他寓所拜會，他留我晚餐並作小飲，只是蔡夫人笑著對

我們說：蔡先生不能吃過兩杯。這是我們最後的晤面。

七、閻錫山

有些人批評閻錫山是「老軍閥」。事實上，閻百川先生是一個很懂政治，很有腦筋，並有他個人立場的人，究竟不能拿他和馮玉祥或其他軍閥相比擬。我在他的內閣和他相處比較密切。當經濟部長出缺時，他徵詢我意見，我推薦嚴靜波（家淦）先生（我想也有別人推薦他），他立刻要我徵求嚴的同意，這項任命就如此決定了。

八、吳貽芳

抗戰期間，我擔任美國聯合援華會會長，負責運用該會每年籌募約六、七百萬美金，分配給各項社會救濟事業以及十三所基督教大學，包括聖約翰、金大、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燕大、東吳、齊魯、之江……等教會大學，因此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長吳貽芳很熟。實際上，我和吳的關係很深久。我擔任金大董事會董事長以及後來在教育部工作，經常和吳往來。

吳貽芳，是一個工作努力並有腦筋的人。可惜她在政治立場上與國民黨相左，因此與蔣夫人的關係不太好。蔣夫人原來想提拔她，但是因爲吳貽芳與上海一位牛惠生太太交情很好，她們與

蔣夫人有隔閡，不太能協調，以致她終爲中共所利用。

我曾勸吳貽芳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遷臺，她不肯。我也曾勸俞大在臺復校，惜都未能實現。

九、賈景德

賈景德是前清舉人，才氣縱橫，多才多藝，寫的一手好字，也很會做菜。有一道名菜是賈景德發明的，可惜我忘了那道名菜的名稱。賈景德還會看相，他說我的面相很有福氣。我不相信算命看相這類事情，但是，聽聽也無妨。賈煜如是閻百川的好友，閻任行政院長時，賈爲秘書長。他們兩人合作無間，情同手足，在歷屆行政院長與秘書長之間，像他們關係這樣密切的是很少有的。

十、淩鴻勛

中英庚款會基金中部分借充興建粵漢鐵路，淩鴻勛主持粵漢鐵路株韶段興建工程，所以有幾年時間，我們因公常在一起，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提到我擔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時對興建粵漢鐵路提供的協助。

淩鴻勛不但在工程方面很有貢獻，對其他方面也很有研究。來臺後，擔任中油公司董事長。

淩竹銘是交通大學校友並曾任校長。交大在滬時，曾因學潮而由教育部命令整理，我任主任委員，等於校長。我曾邀請歷任校長商討如何恢復交大良好風氣，加強教學，使它繼續爲國家造就交通方面的人才。經過將近一年的努力，總算完成教育部交付的使命。

十一、楊杏佛

我很欽佩楊杏佛，他聰明睿智，很有才幹。他是有名的怕太太。國府在南京成立不久，有一次中央研究院開籌備會，楊杏佛甫走入會場，有人說：「怕老婆的人來了！」過了一會兒，傅斯年進入會場，楊杏佛便說：「怕別人的老婆的人來了！」傅斯年很怕趙元任的夫人楊步偉，楊步偉會動手打傅斯年。這時有人跑上臺說：「我們都是怕老婆的！」並且問蔡元培：「是不是？」蔡元培因爲正在與旁人說話，沒留心聽那人說些什麼，連聲答曰：「是！是！是！」第二天，各報都刊登了這則花絮新聞。

我由英美留學回國不久，楊杏佛便向蔡元培建議聘我爲中研院兼任研究員。蔡和林語堂等在滬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由楊杏佛任總幹事。蔡曾函請我在南京成立分會，我因當時民意重在抗日，雖不忍拂蔡先生的願望，但終於函謝。杏佛後來居然被人暗殺，民權同盟也就湮沒了。

十二、戴傳賢

戴季陶是黨國元老，下筆成文，書法優美。我留學返國後，曾被他聘任考試院編纂，參加考試院的籌備與創始。他能言善道，博古通今，待人寬厚，處事容忍，我和他雖不親密，但仍富有感情。

他和印度方面頗有交往，曾創立中印協會，我後來亦爲該協會的委員，並和尼赫魯熟識。尼在一九四一年來渝訪問數週，我便是負責招待者。一九四七年尼在新德里召開亞洲關係會議，但未和我國事先商量，因此有人主張我國拒絕參加，戴則堅主應邀，我後來亦是出席代表之一。

戴季陶信佛甚篤，但因憂國積慮，身體日漸衰弱。我最後看見他是在南京機場，他因病睡在擔架上，預備飛往廣州，有少數人包括朱家驊和他同行。

十三、傅斯年

當我建議將故宮文物遷移臺灣時，傅斯年並不熱心。他甚至反對移動中研院史語所的收藏。他說：「如果共產黨來了，我就從鷄鳴寺城牆跳下去！」此話當然不能認眞。後來他還是到臺灣來了，而且教育部派他接任臺大校長，他積極反共，並且贊助我

將文物遷臺，包括史語所的收藏。傅孟眞是一個血性人物，我們相交數十年，但從不談私事。我最後看見他是在一個擔架上，那是在他病倒在省議會裏，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我不禁爲這一位傑出學人悲哀。

十四、蔣復璁

大陸淪陷，蔣復璁先到香港，準備從此不再管事。

我們從南京將重要文物遷臺時，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也包括在內，但文物運抵臺中後，蔣館長就去香港了。我當時成立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時，聘他出任管理委員，他說他已進入天主教會，留起鬍鬚，不預備再出任公職了。嗣故宮博物院在臺北恢復，政府聘他爲院長，他才欣然接受。

十五、孔祥熙

我擔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時，曾與傅斯年、楊振聲、周炳琳等二十幾人，經常聚餐，會商國事。記得當時有部分人士對孔祥熙院長不滿，曾向蔣委員長表示。蔣先生爲此曾向王世杰秘書長說：「你們都不了解孔祥熙！孔祥熙這個人做人很有中國人的風度，他自己不要錢。至於宋子文這個人則是西洋人作風，並不講道義！」後來宋子文繼任行政院長，他的表現，與孔祥熙截然不

同。

孔、宋兩位任行政院長時，我以教部次長常代表教部參加院會。孔討論議案時，喜歡短話長說，宋則寧願長話短說，所以孔主持的院會常拖延一上午，而宋則經常在一小時左右結束。

十六、周恩來

國府決定封鎖延安時，我曾向一印度報人表示，基於人道立場的考慮，衛生、醫療等用品，應不在限制之內。蔣先生看到國際宣傳處的報告後，很不高興。他向我說：「你不懂共產黨！」但是周恩來因此對我很是欣賞（周的太太鄧穎超當時也是參政會二十五名駐會委員之一）。

中共對我將我國文物播遷來臺一事，原先並沒有什麼表示。三十八年秋，英國大使史蒂文生還曾經向我轉達周恩來的口信，邀我留在大陸，繼續擔任教育工作。我對史蒂文生說：「我對共產黨沒有幻想！」拒絕留在大陸。不及半個月，我即被列在戰犯名單中。

一年後，當一艘英艦被中共海軍砲擊後，我與史蒂文生在香港總督官邸午宴時，他承認我當年對中共的判斷正確。

十七、孔德成

我奉命赴泰國就任駐泰大使前夕，晉見蔣先生，蔣先生問我，故宮派什麼人接任主任委員？我說：「孔德成！」蔣先生不說話。繼又問我：「誰擔任東海大學校長？」我答曰：「曾約農。」蔣先生說：「很好！很好！」蔣先生那時對孔德成還不够瞭解，但以後中央就逐漸認識這位孔聖後裔的才華了。

十八、張　羣

我第一次見到張岳公是在東京，那時國民政府剛建都南京，他在東京和日政府接觸，同時向僑界作公開講演，我那時剛剛留學英美返國，經過東京，受邀和戈公振、陳源向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所辦的暑期講習班講課。抗戰以後，接觸頻繁。記得他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時，我去成都處理學潮，在他辦公室裏，我們兩人從上午十時許，一面談話，一面分別聽候省保安司令和教育廳長關於學生遊行情形的報告。我們每人一瓶威士忌酒，中午喝完了又各加一瓶，下酒的只有花生米一小碟。到下午三時餘學生散了，我們才回去吃午飯。實際上，一瓶半威士忌使我們感覺並不太餓。

在何應欽內閣裏，我任教育部長，他任政務委員，他很關心四川大學的經費和人事，我也常得他的支持。到臺灣以後，我們經常在各種場合見面。至少每週日可在士林禮拜堂相聚。最近一年，他已上壽逾百，因而甚少外出，要見面只有到他府上拜候了。

十九、梅光迪

和胡適之在美辯論文言文與白話文的梅光迪，是一位溫文儒雅的學者。我在金陵大學尚未畢業前，曾參加東南大學暑期班，那時胡和梅都是講師，我曾上過兩位學者的課。我和梅也就因此建立了友誼。我當時翻譯了一本流行的「將來之大戰」，由他介紹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我後來返國在中大任教，他和太太爲我大請客，並請了幾位少女預備爲我介紹做朋友。因爲我正「待字閨中」，所以金大的好友陳裕華也請我並約了幾位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校友，他的二姊四妹也作陪。我特別欣賞他的四妹，向他道出，他說他無意介紹他的姊妹，並且四妹就要回燕大任教了。可是這一面之緣，燃起了我的追慕，經過大半年的努力，終於在北平和越梅訂了白首之盟，後來就和她在南京結婚了。

二十、顧孟餘

顧是一位沉默寡言有守有爲的人。我在他任鐵道部長時，和他時常見面，那時中英庚款正貸借大筆款項建築粵漢鐵路株韶段。他在抗戰初期住在香港。當汪精衛由渝赴寧搞僞組織時，中央顧慮顧孟餘會不會隨汪行動，曾派我去香港見他。他開門見山向我說：汪做錯了，他不會助紂爲虐。後來他爲表明心跡，由港

返渝，中央嗣亦任命他爲中大校長。

二十一、宋慶齡

宋氏三姊妹，尤其美齡與慶齡女士，不特在中國，卽在全世界，也算是曠代傑出的一對婦女領袖。這不僅因爲她們各自本身的才華，同時也是因爲她們的夫婿都是把握著國家民族命運的偉人。

談到慶齡女士，我在重慶時，寓所和她相近，時常見面。有一段時期，她每天下午，請我們夫婦吃茶，吃的主要是一碗酒糟，裏面放一個鷄蛋。經過一個月後，我問她有什麼事我可以幫忙。她終於表示希望我參加她的工作，但我因本身工作忙，且她的立場含濃厚的政治性，所以我只得婉謝。此後我們還是有來往，但變成偶然了。

記得一次，中英文化協會園遊會，我請她參加。我們夫婦到她住處接她，她臨行前親身關閉玻璃窗，但不小心將一塊玻璃撞碎。她的手指也割破流血，我要立時請醫生來，她婉謝了，並用手帕將指裹住，就和我們一同參加園遊，直等散會回府，我才請來相熟的醫生爲她清洗敷藥，這件事，使我對她有深刻的印象。所可惜的，她後來正式與中共打成一片，而爲中共所利用。

二十二、胡　適

前面提到我與梅光迪的友誼，在情感上，確是相當深厚的。同時，我與胡適之在理念及工作上，亦建立了密切的關係，這是出於時代的需求與環境的發展。北平爲中共佔有後，胡適與梅月涵（清華校長）南下移居上海。我那時因爲教育部改組，也由京到滬，主持行政院善後事業管理委員會。該會在滬有招待所，我請他們在招待所，每日共餐。記得月涵因失去清華而煩悶，每餐常飲數杯，很容易醉臥。我則和胡適計畫如何反共，並開始籌備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適行政院於民三十七年改組，新任院長何應欽在京，代總統李宗仁在滬，兩人用電話商量新部會人選。關於教育部長一職，李主張請胡適，並親晤胡，胡不願就並推薦我擔任。是晚聚餐時，胡、梅均力促我接受。我接事來臺後，就召集會議，決定發行自由中國半月刊，並指定雷震爲總編輯。我們均在該刊經常寫文章，並時常聚餐商量推行反共政策及民主政治。胡後來赴美，我們經常通信。其間他對於王雪艇被蔣總統免去總統府秘書長職一事，甚表關懷，他打電報來問我，我詳函告知。不久他返臺幫助平息這一人事糾紛。胡和王雪艇嗣後也先後被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我也出國任外交使節了。

二十三、汪精衞

一位原是開國元勳，但由於判斷錯誤，走入不可原諒的賣國之途，並由於他的過失，毀誤了若干可用之才，這人就是汪精衞。

我認識汪是他在南京任行政院長的時候。他邀請了我和若干知識分子到廬山，討論國是。後來他到重慶擔任國民參政會議長，我是參政員。他有第一流的口才。記得參政會開幕之日，他致開幕詞，他以流利的言語，情感的措詞，煽動了全體聽眾。到後來幾乎每一兩句話就贏得熱烈的掌聲。次日開會時，我臨時提案以全體參政員名義，表示擁護他做議長，也經過全體鼓掌通過。

可是他後來對抗日戰爭沒有信心，同時不甘於聲勢威望遜於蔣委員長，竟由重慶溜到南京搞僞組織。他離開重慶的前兩天，忽然約我談話，那時我擔任蔣委員長和英國的聯絡人員，他想要知道英國政府是否會堅決抗日，我告訴他我所知道的英國政策，他沉默的聽了，我當時還以爲他眞是關心國事咧。

二十四、鄭天錫

鄭莆庭是司法界傑出的國際知名人士。他擔任過國際法庭的

大法官、我國司法部的次長、駐英大使等職。他也是我們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的法律顧問。我們貸款給生產事業，每筆貸款都有契約。我每次在簽訂契約前，必定將契約底稿拿給鄭顧問審閱，我因此亦獲得若干司法詞彙常識。他後來寓居英國，我也幾乎每年去英國訪問，並與他晤面。他對烹調藝術很有研究，常到厨房親自配菜宴客。他對於酒亦有研究，我參觀過他的酒庫，藏有各種名酒。他的公子鄭斌，亦是法學家，在英國倫敦大學任教多年，現已退休，但仍到各處作學術講演。他的夫人是名外交家傅秉常的女公子，名門佳偶，揚聲海外。

二十五、張君勱

張君勱是哲學家兼政治家。我和他開始認識是在我留學回國後，他當時任上海國立政治學院院長。他聽說我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拉斯基教授的學生，而他欣賞拉斯基的政治學說，因此他寫信來要聘我任教授。我因另有承諾未能接受，但對他的好意留有印象。嗣後我出版「政治典範要義」一書，介紹拉斯基的巨著。幾乎同時，他將拉氏此一巨著譯成中文，同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我翻閱他的譯文，發現若干處與原文不盡相符，於是就從頭替他校對，並將校對結果函送他參考，這算是我對他善意邀請的回報。實際上，他在組黨辦學之餘，匆匆將一巨著譯完是不容易而值得欽佩的。

抗戰期間，我們同在重慶。他的胞弟張禹九和我住的很近，並且同在一個大園地裏。君勱常到禹九處走動，因此我們也常有機會碰見。我們也同在國民參政會。抗戰後憲政開始，君勱最大的貢獻，是起草現行的憲法，他耗盡心血，使國父的民權主義與歐美民主政治的觀念，在中華民國憲法中獲得折衷而落實。

附錄一　杭夫人談杭立武先生

陳越梅女士口述

時間：七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

地點：臺北市敦化南路三九〇巷一二號主婦之店

訪問：王　萍

紀錄：黃銘明

一、對家庭的態度

杭先生對家庭的態度是：工作忙的時候，工作重於家庭。比方說抗戰的時候，他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 Miss Fortune 以及 YMCA 的 George Fitch 等人在南京籌辦難民區的事（請參閱前文第四章），我們原本計畫一同坐船到重慶，那天，他先把我們送上船，說好晚上開船時會來，結果因爲難民區的事情辦不完，臨開船時才派人來說他不能來了。所以他對家庭的態度是能顧到就顧到，不能顧到也沒有辦法。當時朝天宮也希望劃入難民區，目的是保護古物，因爲日本兵已經快要進城，杭先生在風聲鶴唳下展開遷運古物的工作。古物和難民都上了最後一艘船以後，

船長說：「杭先生，你一定要上船！你若不同我們一起走，我們就要把古物搬下來，怕的是日本要轟炸。」一定要他跟著走，他只好上船。但是上船的時候，因爲難民太多，他上不去，最後只好用吊繩把他吊上去。到了重慶，他的辦公室在兩路口，有時要躲警報，他也顧不了家，讓我自己帶著孩子去躲警報，他得照顧辦公室的人與物。

他會不顧家也是因爲他過去環境好，從小不需要顧家，所以沒有這個習慣。不過現在剛好相反，老了嘛！其實他也不是完全不顧，只是很看重事業，腦中總在計畫，一會兒辦這個，一會兒辦那個的。比方說亞盟是個反共機構，他說我們成天喊「反共」、「反共」，學人會煩，我們的目的是反共，可是不要說出來，所以他就辦「亞洲與世界社」，實際上是反共機構，但他不倡口號，不說是反共。他這人很愛國，但嘴裏也不說，只是想辦法做出來。像他從事人權工作，等於也是反共。人權組織之後他也辦「港友會」，因爲政府以前對香港的問題比較少注意，而一九九七香港大限就要到了，他認爲此時我們應該對香港人有更積極的關心態度，所以他就組織「港友會」，打算爲香港人做一點事情，後來慢慢把澳門也包納進來，改爲「港澳友會」。他的確不斷地想事情，也喜歡做事，所以他常常有各種計畫。像「中英文化協會」，尤其在中英斷交後，他覺得我們仍然應該和英國人做某種程度的聯繫，也就在倫敦成立了這個組織。因爲他有這麼多計畫，所以他的辦公室給「港友會」一間屋子辦公，也給「中

英文化協會」一間屋子辦公。他另外還發起「海線交通研究會」，也設有辦公室，並且爲他們找經費。此外還有「留英同學會」，把留英同學組織起來。

總之，他是一個很想做事的人，所以家裏有什麼事他都不曉得，有沒有什麼需要他也不問。他在「亞盟」做事是不支薪的，只領國大代表的薪水。亞盟秘書處是國際性的組織，事實上他可以比照國際標準支薪，而且可以領美金，過去別人都這麼領。亞盟秘書長以前是越南人，他就是領美金。越南淪陷後，他被推繼任，得找個地方辦公，日本、韓國都不願意，因爲秘書處在哪國，那個國家就要出辦公費等各種費用，最後交給臺北辦，不過他只辦事不支薪。此外，雖然人權協會和港友會的工作很忙，但他也都不支薪。他在亞盟秘書處的辦公室有兩個門，一個通亞盟，一個通人權協會，亞盟和人權協會的客人各走各的門，既經濟又方便。

他就是喜歡工作，八十幾歲的人照樣早出晚歸，也不覺得累。說他不顧家嘛！他有時也頗關心。像抗戰時他也帶小孩逛街，買一包栗子回來帶著小孩躲著吃，不讓我知道——因爲我不喜歡孩子們有吃零食的習慣——。

他對名利實在很淡泊，不同人家爭。像今年他得行政院文化獎完全是意外，獲獎原因是他兩次維護故宮文物的安全，一次是在中日戰爭期間，一次是在中共攻打南京之前，他負責將文物護送到臺灣。過了這麼多年，照說早就該得了，但他從不作聲，只

覺得能做一點事就非常快樂，別人注不注意都沒有關係。所以受勳的時候他說：「我們都把這件事忘記了，你們現在又給我獎。我做這些事覺得很快樂，給我獎金實在沒有必要。」於是他就把四十萬獎金都捐出去，二十萬給故宮，二十萬給人權協會。給故宮這點錢根本買不到東西，他的目的只在拋磚引玉，希望成立一個基金會，專門收集中國古物。他不看重金錢，身上從來不喜歡帶錢，平常的理髮錢都得臨時跟我拿，他常常對朋友說笑話：「我太太不給我錢用。」實在是他自己不喜歡在身上帶錢。

二、個性和嗜好

他這個人不服輸，如果有人向他挑戰，他一定接受。比方說，有時我們想一個多少年前的朋友的名字，想不起來，他就早上想，晚上想，非把它想出來不可，這也是對他自己的一種考驗。即使是一件小事，他也不輕易說：「我不行了。」

他也不怕威脅，有一次亞盟開會，事先有人恐嚇他們說會場有人放定時炸彈，亞盟人員就建議改變開會地點，但是杭先生不怕，照舊開會，像這樣的情形有兩次。

他常對我說他做人有一個原則，就是「今日的事當作明日黃花，昨日的事仍在今日檢討。」意思就是說他遇到任何麻煩和複雜的事件，如在重慶、成都及南京、上海、杭州時，常常面臨幾千或上萬學生的遊行或示威，他從不迴避。當時他的職務是教育部

次長，他總是堂堂正正的出面和學生對話，對於有意胡鬧的部分學生，雖沒法以理智克服，也盡量爲他們解決問題，如此一來，大半都可以和平了結。對一件事在未發生前以及發生後如何處理，他都有一個輪廓，所以能够很理智的去把握它。所謂今日的事作明日黃花，就是很平和、很冷靜的應付一切要來或未來的問題，拿今日的事作爲已過的事來考慮和解決，這樣就可避免意氣和情感影響了。等待事過境遷以後，到了明天，他還要把較重要的事情回想一遍，檢討有無不週全的地方，以爲未來的參考。我觀察他，他對自己所定的做人原則眞能身體力行。

他非常關心時局，所以一天到晚不曉得要看多少報紙：臺灣的早報、晚報，和香港、菲律賓、泰國、歐洲的報紙，各種立場不同的雜誌他也照看不誤，所以我說他是報章雜誌的奴隸，到哪都看，手不釋卷，絕對是個閒不住的人。從前在南京的時候沒有那麼多報紙看，他就背古文、四書五經，有時也叫孩子背，他背一句，小孩背一句，他們樂此不倦。

他最怕浪費時間，所以他一天到晚看書報。可能是小時候沒有休閒習慣，所以他不喜歡遊山玩水，覺得那是浪費時間。我們到希臘的時候，我就勉強他了，因爲希臘這個地方古蹟名勝很多，不去走走太可惜，而且希臘使館人數不多，所以都是團體行動，週末或假日只要幾部車，各家開自己的車就一同出去了，我說：「你不能不去啊！」拉著他去，這樣才慢慢好一點。這方面他和我性情大不相同，我愛休閒活動，他就是不愛。他說這太浪

費時間。但同小孩子他有時也陪他們玩：踢毽子啦！吃小吃啦！他都來。但是他平常不吃零食，鷄尾酒會時他喝一點酒，但不吃點心。平常除了飯後的點心之外，其他時間任何東西都吸引不了他。但是吃飯時該有的東西都要有，他很注意食物的營養，所以他是個相當有原則的人，喜歡生活有規律。

他自己不好運動，但他唸大學時最喜歡看足球，是個足球迷。從前幾個教會大學足球比賽，他是一位忠實而熱誠的觀眾。

我想如果有好環境，他一定很喜歡音樂。我國的平劇他從小就喜歡，他不會唱，卻很喜歡聽，而且要聽好的。學生時代有一次他去北平參加留學考試，爲了穩定情緒，不但不緊張，反而趁機看了好幾場名伶的戲。現在一到禮拜六，他一定準時打開電視看平劇，這是他難得有的一樂也，絕不輕易放棄。回想當年我們剛結婚還沒小孩的時候，因爲我喜歡彈琴，他也喜歡學，可是又沒時間從頭學起，就要我用簡譜教他。他根本不認識樂譜，倒也學會彈幾首較短的曲子。有一段時間他也喜歡聽歌劇，買了很多唱片，不過現在沒有時間，就只聽平劇了。

三、養生之道

杭先生有一個很好的習慣是：他從年輕時代生活就很有規律，起床和睡覺的時間都是固定的。現在年紀大了，有時頭一天累了點，第二天會晚一點起床，起來以後他就會懊惱的說：「我

今天起遲了！」因爲生活有規律，不喜歡浪費時間，所以他一直有時間做很多事。

他對日常生活的要求並不怎麼嚴格，但有一定的標準，你不能少他一樣。比方說他吃早飯，一定要有新鮮的橘子水、香蕉、麥片、牛奶、幾粒紅棗、一點紅蘿蔔。香蕉只有他一個人吃，買多放久會爛，可是你不能少他。有時跟他說：「中午補你嘛！」他說：「中午是中午的。」只好趕快上街去買，買少了不好意思，買多了也只好讓它爛掉。那麼多年，他也不改變口味。再比方說，他喜歡吃他妹妹做的燻魚，她每個禮拜都送一盒來，他就每天早餐時吃，這樣已經維持了一、兩年，他也不厭倦。所以朋友看他吃早飯都很稀奇：「怎麼吃那麼多東西！」此外，他也很注意營養，維他命A、B、C、D……都吃，每天早上，他自己面前一堆維他命，也在我面前放一堆。他也很注意睡眠，從前一到時間就睡，現在隨便一點，不過也差不太多。他中午一定午睡片刻，一上床很快就睡著。

他很注意健康，只要有人講生活經驗令他覺得對健康有幫助，他就馬上學。抗戰時他曾經問一位美軍將領：「你們打仗那麼忙，怎麼有時間睡覺？」對方答：「我們訓練自己啊！跟自己說：『睡覺！』就睡覺。『睡十分鐘！』『睡五分鐘！』就睡十分鐘、五分鐘。」他聽了就學。再比方說，有人告訴他一種簡易的運動方法：「站著，然後慢慢蹲下來，坐在自己的腳後跟上，這個不容易哦！」他也學。這是近十年的事，那時他七十多

歲，起先蹲不下去，現在不只能蹲下去，還能保持身體平衡地蹲好一段時間。他以前學過打拳，後來不記得了，就自己編一套，既不是拳，也不是操，每天早晚活動一遍。人家說要運動牙齒，他也照做，至今他的牙齒的確很好，只有幾顆是假的。又有人說：把粗大竹子剖成兩半，空心的那面朝下，放在地上，赤腳踩在凸起的一面，對身體很好。他就每天踩。類似的事情還很多，只要人家對他的健康有什麼建議，他一定照做，譬如有人說：溫開水是最好的飲料，因爲它和人的體溫相近。他就不喝茶、不喝咖啡，只喝溫開水。中國人說黑芝蔴很好，把黑芝蔴洗乾淨，泡一下鹽水，濾過以後乾炒，炒熟就可以吃，他就吃了二十年。又有人說葵花子很好，他也照吃。美國進口的葵花子是烘烤過的，他就把黑芝蔴和葵花子混在一起，每餐一匙，嚼著吃。所以他的身體那麼健康，不是我照顧得好，而是他自己照顧了自己。

他每天都很注意氣象報告。電視他不大看的，他說那是浪費時間，可是他每天一定要看臺視的氣象報告，因爲臺視不但預測明日的氣溫，也報導今日的實際溫度。不在家吃飯時就請人代記下來。晚間新聞若是錯過的話，就要我看十一點的氣象報告。他的目的是要看看今天天氣究竟如何、明天有什麼變化，好決定明天穿什麼服裝。其實他穿衣向來簡單。冬天也只穿外套和襯衫，內衣仍然是短袖、短褲，從來不喜歡穿毛衣或大衣，也不穿衛生衣褲，冷了頂多加件絨背心或西裝背心，說是要訓練自己的抵抗力。

他有每年檢查身體的習慣，在國內檢查時，他只挑主要項目

做檢查，如果剛好出國，他就到女婿服務的醫院檢查。我們的大女兒夫婦都是醫生，他們的女兒和我們的小女婿也是醫生，大女婿在德州（Texas），小女婿在芝加哥（Chicago），外孫女在紐約，所以有此便利。此外，他自己也很注意自己的健康狀況，發現血壓稍微高一點，就自己注意一下，不用吃藥，自然會降低。他很少生病，頂多是傷風感冒而已。所以是天給他這麼好的身體，加上自己注意，才能維持今天這樣健康。

他很有酒量，但是不好酒。別人若要同他比賽，他也不拒絕。和王雲五老先生比酒量是一個例子。張岳公也喜歡喝酒，在四川的時候，張岳公當省主席，杭先生在教育部當次長，學生鬧學潮的時候，他們倆常常在一起研究對策，對飲威士忌，喝完一瓶可以再來一瓶。到了臺灣，張岳公的副官對杭先生說張先生最好少喝一點酒，所以酒席上杭先生就故意對岳公說：「岳公，我不行了！」岳公才作罷。他擔任泰國大使的時候，因爲泰國人喜歡喝酒，尤其泰國軍人都喜歡鬧酒，在酒會中他也能够喝幾十杯黃酒沒事。現在遇到老朋友也還可以乾幾杯，倒是我勸他不要過量。總之，他很有酒量，但並不喜歡酒，所以平時在家都不喝。

他能保持這樣的狀況，除了生活規律，注意營養、睡眠和重視健康之外，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性情平和。我們相處五十餘年，沒見他發過脾氣或大聲指責人，我可以同他爭吵，但他不同我爭執，所以我們吵不起來。我講再急的話，他都不作聲。他也從來不對人講一點重話，總是讓人，所以同事間不曾有

過摩擦。

四、宗教信仰

杭先生是基督教長老會信徒。他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唸教會學校，但他並沒有受洗，一直到我們要結婚的時候，我母親說：「你一定要做基督徒，因爲我女兒不能嫁給不是基督徒的人。」他說：「沒有關係啊！我也沒有反對受洗。」受洗的時候，教會也很重視，爲他安排了三個牧師，一同參加他簡化的儀式。現在我們每天吃飯和睡前都一同禱告，吃飯時的禱告我做，睡前禱告則由他出聲做，然後一起背詩篇二十三篇，再各自就寢。我們平常在士林的凱歌堂做禮拜，凱歌堂是不分教派的。他對宗教不敢說是怎麼樣的虔誠，家居生活中，他也並不太熱心宗教活動，但信仰還是有的。他每天早上自己看一段聖經，每星期做禮拜。凱歌堂的禮拜上午十一點開始，如果他早上有事要參加，我就先去教堂，他辦完事再趕去。禱告中如果有事求神，他也自己開口講。

五、惱人的重聽

他現在有一點重聽，他耳朵剛開始不好的時候煩得很，現在比較能接受事實了。但他不服輸，最近有人說他這種重聽可以開刀，他就想去日本開刀。我說：「你年紀這麼大了，不要去吧！

這樣罷！如果雷根總統開了刀，我就陪你去開刀；如果美國總統不開刀，就表示這種技術還在試驗階段。」所以他現在雖然不一定要去開刀，但還是常提這事。其實重聽並不影響他的思考、寫文章，或是演講等活動，而且人老了，總會有一些缺點，他已經不錯了，視力、精神都很好。我很滿意、很感謝神恩了。

六、平淡之交

杭先生穿衣服一定整整齊齊，領帶、西裝的搭配至少要過得去。他穿著不喜歡有花色，都是淡淡的。他的個性就是淡淡的，交朋友也是淡淡的，人家誤以爲他沒有感情，其實他並不是沒有感情，就是像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那種味道。比方說他和王雪公（註：王世杰先生，字雪艇。）交情很好，但是他不掛在嘴上，王先生過世後，他逢年過節一定去看王夫人。所以他對朋友還是很關心，只是嘴上不多說，不隨便流露感情。

對我嘛！有時候也是那麼淡淡的！不過有時候也很有心，比方我生日或我們結婚紀念日，他都會買東西送我，可是有時候又好像完全不記得。我們已是五十多年的老伴了，彼此了解得很多，大家身體健壯，孩子們都好、都平安，是夠幸福了。

七、杭夫人的家世

王　萍：杭夫人，您本身出自名門，令兄陳裕光是有名的教育

家，當過金陵大學的校長，您是不是可以簡單介紹一下您的家庭？

杭夫人：我們是浙江寧波人，家父是建築師，曾祖父做過官，到我祖父可能因爲是獨子，不知節儉，祖母因爲祖父的大少爺習慣使家道漸漸中落，她信了基督教後，就想辦法把我父親教養成人，爲我父親挑選媳婦，同時把信仰傳給我的父母，代代相傳，到我的子女已經是第四代信主了。

我一九三〇年畢業於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體育系。金陵女大最著名的是體育、音樂、家政三個系，我本來想學音樂，但 Miss Southerland 老師認爲我個性好動，不適合學音樂，剛好體育系有一位老師和 Miss Southerland 是很好的朋友，就向她建議讓我主修體育，副修音樂，二者兼得。

我父親造了很多禮拜堂，他是個虔誠的基督徒，所以這是他最高興的一件事。因爲當時會蓋西式建築的人很少，大家相信陳老板，要他到各地去建造禮拜堂。他建禮拜堂的態度非常認眞，一定要用最好的材料，而且是照成本計算。金陵大學校園內的禮拜堂也是他造的。

我本來的名字是越美，排行第七，是第四個女兒，出生的時候，我媽媽不因女孩多了而嫌我，就說：「越看越美！」就叫我「越美」。後來我曉得了，看看自己並不美，就把「美」改成「梅」。我三姊信美在美國，

沒有結婚，現在身體不大好。Mary 是二姊，原名「寶珠」，寶珠不大好聽，她就自己改名爲「竹君」。大姊叫陳聖婉，大哥陳裕光、二哥陳裕華、二嫂黃麗明(後來做明德女中校長)、三哥陳裕康、弟弟陳裕耀。我們這一家有好多金大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畢業的：二姊、二嫂、三姊、弟媳和我都是女大的；大哥、二哥、三哥、弟弟和立武都是金大的，總共五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五個金陵大學，很少有整個家庭和這兩所大學關係這麼密切的。值得一提。

我們兄弟姊妹八人，現在只剩我和我的三姊信美。我大哥陳裕光最近在大陸去世，我去看過他。他去年六月生病住院，十一月的時候叫他身邊的小女兒寫信給我，說他很想念我，四十幾年不見，有話要同我講。這麼一說，我就決定回去看他。當時由兩個外甥陪我去，我每天到醫院陪陪大哥，他念念不忘金陵大學的將來，切盼能够復校。我在南京待了一個禮拜，在大陸頭尾十天就回來了。他晚年身體很虛弱，不過腦筋還很清楚。本年四月十九日他的小女兒打電話給在美國的姊姊，再由她姊姊從美國打電話給我，說我大哥很平安的去了，享年九十七歲。在臺灣的校友會也在今年六月舉行追思禮拜。聽說在美國的校友會還籌備成立紀念基金，以使他的精神永存。

附錄二　杭立武先生年表

民前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生於安徽滁縣。

民國二年　入滁縣基督中學。

民國五年　考取南京金陵大學附屬中學。

民國八年　直升金陵大學（民國十三畢業）。

民國十一年　譯將來之大戰（The Next War）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民國十四年　參加安徽省公費留學考試，考取第一，同年赴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深造。

民國十六年　由英赴美威斯康辛大學擔任名譽研究員。

民國十七年　獲頒威斯康辛大學榮譽碩士學位，旋即返英。

民國十八年　獲倫敦大學頒授博士學位，完成學業返國。應考試院院長戴季陶之聘任考試院編纂，兼任考選委員會編纂室副主任，並於金陵大學兼任研究教授。

民國十九年　任中央大學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並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特約研究員。

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　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民國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再度出任該職）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　中國政治學會在南京成立，先生爲理事之一，並兼任總幹事。

民國二十二年　在南京成立中英文化協會，開中外文化交流之先鋒。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　日軍將入南京，邀約各國在京人士組織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藉以收容難民，先生爲主任，費吳生爲副主任，是爲先生難民服務工作之始。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　負責搶運故宮博物院古物至川，是項工作至民二十八年四月始告結束。

民國二十七年　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爲二十五位駐會委員之一。

民國二十八年　任美國聯合援華會會長。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　抗戰時期先生爲蔣委員長對英聯絡人，代表蔣委員長赴英面見英相邱吉爾，表達我方對封鎖滇緬公路之關切。

民國三十年　任國際學生救濟委員會會長。

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　參加中國訪英團赴英訪問。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　任教育部常務次長，並兼任中央設計局教育組召集人。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　調任教育部政務次長。

民國三十六年四月　代表我國出席泛亞洲會議。

民國三十七年底　負責故宮、中央兩博物院、中研院史語

所、中央圖書館及外交部等五個機構之文物、善本書籍、重要檔案搬運來臺工作，至三十八年二月結束。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出任教育部部長，兼任國立中央博物院館聯合管理處主任委員。

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　主持河南出土古物由四川遷臺工作。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九日　由成都飛抵臺北

民國四十年　任總統府顧問（至民國四十五年）。

民國四十一年　任「援助流亡中國知識分子協會」中國董事會主席。

民國四十一年　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臺中區主任（至民國四十五年）。

民國四十二年　籌組華美協進社。

民國四十三年六月　任基督教大學（即東海大學）籌備處主任，十月被推爲首任董事長。

民國四十五年八月　任駐泰國大使。

民國五十一年六月　兼任駐寮國大使。

民國五十三年六月　調任駐菲律賓大使。

民國五十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與菲國外長羅慕斯(Ramos)簽定 Ramos-Han 協定，解決逾期華僑居留問題。

民國五十七年　菲律賓拉塞爾學院頒贈榮譽教育學博士。

民國五十七年七月　調駐希臘大使。

民國五十七年八月　菲律賓大地震，組賑災委員會協助救

災。

民國六十一年　希臘承認中共，自希臘返國。旋任國際關係研究所主任。

民國六十二年　任中國政治學會理事長。

民國六十四年　任亞洲人民反共聯盟秘書長。

民國六十五年　成立亞洲與世界社。

民國六十八年二月　成立中國人權協會。

民國六十九年　發起組織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

民國七十年　任中國政治學會名譽理事長。

民國七十五年三月　成立香港居民之友協進會。

民國七十七年　成立「自由民主和平統一中國促進會」，被推爲名譽會長。

附錄三　杭立武先生著作目錄

將來之大戰（譯）　上海商務印書館　民國12年

政治典範要義　上海黎明書局出版　民國21年12月26日

中華文物播遷記　商務印書館出版　民國69年3月　民國72年11月出版日譯本，由正中書局總經銷

國民政府時代之中英關係　商務印書館出版　民國72年

（附「訪英簡筆」）

拉斯基政治多元論　與陳少廷合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　民國76年

今日臺灣（英文）　正中書局　民國76年

苦撐待變　爲「自由中國」二週年作　民國40年12月1日

勝利中的敗績　民國57年3月15日應菲律賓岷里拉早餐聯誼會講演，載於民國57年4月7日菲律賓公理報　民國57年3月

建設三民主義大社會以爲壽　民國61年10月

紀念孫洪芬先生　民國62年9月

中共內幕　載於「中國報導」第五期　民國62年9月

中國文化接受考驗　載於「中央日報」　民國62年10月15日

第三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觀感　民國62年12月

從臺灣看大陸和全世界　在臺灣省垣各界聯合總理紀念週講演，載於「臺灣黨務」民國63年5月號　民國63年5月

第三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及文化交流研討會」專書序　民國63年9月

從聯合國拆除大同篇石刻談國際現勢　載於「聯合報」　民國63年10月31日

我與新聞界　載於「新聞學雜誌」第12期　民國64年1月

讀蔣夫人警言述感　民國64年3月

今後努力的方向　民國64年6月

展望未來世局　民國64年

亞洲人民反共聯盟秘書處成立典禮講詞　民國65年3月31日

十年回憶與十年展望　民國65年6月

追憶朱騮先先生　載於「傳記文學」第29卷6期　民國65年12月

堅定信心，滿懷希望　載於「中華日報」　民國66年1月1日

當前美俄匪三角關係之研究　送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臺北研究區國際關係組　民國66年2月

故總統蔣公逝世兩週年　載於「光復大陸」月刊　民國66年4月號　民國66年3月2日

人文精神的愛與善　載於「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0卷第7期　民國66年7月

悼念東美學長　載於「哲學與文化月刊」4卷8期　民國66年8月10日

注視未來的一年　載於「展望」雜誌第129期　民國66年8月16日

光大重慶精神迎接未來勝利　載於「中華日報」　民國66年國慶特刊

加強當前中美邦交之研究案　送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臺北研究區國際關係組　民國66年10月

行憲以來的國民外交　載於「中華民國行憲三十年」專刊　民國66年12月25日

章正著「我們的國歌」序　民國67年2月

紀念周宗蓮兄　民國67年2月17日

從北伐統一到文化復興　載於「光復大陸」136期　民國67年4月

亞洲前途光明中的陰影　載於「展望」雜誌第140期　民國67年7月20日

一年來的憲政偉績　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民國67年年刊　民國67年11月23日

當前政治及外交方面應行興革事項　民國68年1月3日

「當前中共和平統戰陰謀之剖析」研討會致詞　民國68年1月

共匪和談攻勢註定失敗　載於「中央日報」　民國68年1月

22日

「中美關係法案研討會」致詞　民國68年2月

中國人權協會組織緣起　民國68年2月

世局動盪中求安全　載於「展望」　民國68年6月30日

如何建設一個自由安全的大社會　載於「中央日報」　民國68年10月

迎接八十年代　載於「中華日報」　民國68年12月20日

突破當前外交逆境應有作法之研究案　送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臺北研究區國際關係組　民國69年2月1日

懷念蔣公二三事　載於「黃河雜誌」　民國69年4月號　民國69年3月

展望迎接八十年代的勝利　載於「展望」雜誌　民國69年7月號

梅譯「誰之過——中美戰時外交探源：自珍珠港事變到馬歇爾調處」序　楓城出版社　民國70年9月出版

懷念先總統蔣公　爲香港某刊作　民國69年10月

強化外交陣容、爭取主動、發揮革命外交之功能案　送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臺北研究區國際關係組　民國69年11月7日

憲政與人權　載於「中央日報」　民國69年12月25日

光輝金陵——關於文學院的人和事　載於金陵校友通訊　民國70年3月6日

懷念沈宗瀚兄　民國70年3月27日

人生哲學研究會福岡、熊本、鹿兒島、大阪、名古屋五分會成立大會賀詞　民國70年4月8日

王雪艇先生事略　民國70年5月

情理法與法理情——從國家賠償法實施論推行法治　載於「中央日報」　民國70年7月1日

回顧十五年　載於「展望」雜誌

續談文學院的師友　民國70年10月

懷念周自強兄　民國70年11月

法治與政治制度化　載於「中央日報」　民國70年12月25日

人倫、民權與人權——紀念世界人權日　載於「中央日報」民國70年12月10日

金大校長陳裕光先生　民國70年12月12日

金大與我　民國70年12月21日

大學教育發展趨勢　載於逢甲學報　民國71年1月4日

懷念戴仲甫兄　民國71年2月29日

懷念淩竹銘兄　民國71年3月19日

「金陵大學」序　民國71年4月7日

尹立言：「維護自由保障人權」序　民國71年4月24日

論人民守法與政府執法　載於「中央日報」　民國71年5月11日

光復大陸後匪僞駐外機構及其人員之處理方案　民國71年5

月17日

泛論中美關係　載於「中央日報」　民國71年 5 月29日

人權法典序　民國71年 7 月 3 日

「青少年生活教育雜誌」創刊祝詞　民國71年 7 月 9 日

儒家思想的根本精神　人生哲學研究會加拿大總會成立大會賀詞　民國71年 7 月13日

光陰可貴讀書有益　載於「書香旬刊」　第二十一期　民國71年 7 月14日

法律尊嚴與政府威信　載於「中央日報」　民國71年 8 月23日

籌組南京淪陷後難民區的經過　載於「近代中國」雙月刊第三十期　「傳記文學」民國71年 9 月轉載

懷念閻百川先生　民國71年12月 1 日

臨中記述題誌　民國72年 1 月

匪俄關係可能演變之研究案　民國72年 4 月26日

錢剛錚：「中共外交政策及策略」序　民國72年 5 月18日

展望未來一年　民國72年 5 月23日

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我　載於該館館刊16卷 1 期　民國72年 6 月16日

第一屆淡江東南亞研究會議開幕典禮致詞　民國72年11月 8 日

法治、人治與民權——紀念世界人權日　載於「中央日報」

民國72年12月9日

爲楊承彬先生著作「序」　民國72年12月19日

中國人權問題之探討　民國73年4月5日

擴大參與國際事務提升國際地位　載於淡江大學「明日世界」民國74年1月號

蕭曦清著「中非逾期華籍遊客問題的談判與交涉」序　民國74年1月24日

懷念葉霞翟女士　送胡爲善先生　民國74年2月4日

出席第12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開幕典禮中講詞（民國74年3月26日於東京）

西歐各國之對華政策及我應有對策之研究　送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　民國74年3月25日

中大校慶感言　送中大校慶籌委會特刊委員會　民國74年4月29日

西歐各國之對華政策及我應有對策之研究（修正本）　送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　民國74年6月27日

懷念郭華倫先生　送郭乾輝先生追思錄編輯委員會　民國74年7月5日

懷念黃季陸先生　送黃府　民國74年7月24日

一九九七年——其前十二年及後五十年（譯稿）　送「中央日報」　民國74年8月8日

紀念吳鐵老　送吳幼林先生　民國75年2月4日

蔣中正先生與英國 送秦孝儀先生 民國75年6月20日

外交僑務緊密配合發揮整體功能研究案 送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 民國75年7月1日

王故監察委員爵榮生平 載於「中外雜誌」 民國75年6月號

開放組黨與民主憲政（紀念世界人權日） 載於「中央日報」 民國75年12月

母校瑣聞 載於金陵大學同學會會刊 民國75年12月

蕭曦清著「中菲外交關係史」序 民國75年12月

侯夫人劉似錦女史畫册第二輯序 民國76年3月

湯夫人成錦女士著「成錦雜記」序 民國76年6月

反攻作戰時期外交策略之研究 送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 民國76年6月

安全、安定與民權 載於「展望」雜誌 民國76年7月

四十年行憲之過程與期望 國民大會憲政研討會七十六年年刊 民國76年8月

響應人權、實行民權——紀念世界人權日 載於「青年日報」 民國76年12月

「自力」「自決」與民主法治 載於「青年日報」 民國76年12月

行憲以來的對外關係 送國大聯誼會 民國76年12月

翁慧芬著「泰國教育部的組織及其職權的研究」序 民國76年12月

紀念母校創立一百年　民國77年1月

號召中共駐外人員立功起義之研究　送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　民國77年2月

陳驥著「東南亞戰略形勢論文集」序　民國77年2月

憶景蒙才士　民國77年3月

祝賀「一甲子音樂家梁在平教授獨奏會」　民國77年4月

母校百年紀念册序　民國77年4月

劉博士與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　載於劉博士與中國醫藥及衛生事業紀念　民國77年4月

自由民主和平統一中國芻議　載於「中央日報」　民國77年5月5日

美菲軍事基地談判　載於「中時晚報」　民國77年5月

楊志銳著「勇者不懼」序　民國77年6月

自由民主和平統一（展望中國未來）　載於「展望」雜誌　民國77年7月

中國統一，是全中國人的責任——向「自由民主和平統一中國」大道邁進　載於「中央日報」　民國77年6月12日

我與吳三連先生　民國77年9月

我與蔡孑民先生交往的二三事　送文經出版社　民國77年9月

欣賀「世界人權宣言」四十週年　載於「中央日報」　民國77年12月10日

「劉博士與中國醫藥及衛生事業紀念集」序　民國78年 1 月

侯夫人劉似錦女史畫册第三輯序　民國78年 3 月

附錄四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hae Conference

by Dr. Han Lih-wu
Secretary General of APACL

The conference founding the Asian Peoples' Anti-Communist League was held in Chinhae, the Republic of Korea, on June 15-17, 1954. It was my privilege to be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The idea for a governmental anti-Communist organization in Asia originated with the late Pres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He first broached the idea in 1949 during his visits to President Quirino of the Philippines and President Syngman Rhee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The decisive consultations came in 1953 when President Rhee paid a return visit to Chiang Kai-shek in Taipei. But they instead agreed that a civilian anti-Communist organization was more practical.

---

* 本文原載 *30 Years of APACL*一書，1984年8月出版。

As I recall that momentous and pleasant experience of being at the conference, several impressions stand out. First, the Korean government went to great lengths to insure the conference's success; there was a full and fruitful program of speeches and discussions. The Korean delegation was naturally the largest and it included several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A Korean reception committee which included ministers' wives and ladies in high society handled the entertainment and care for all the delegations. After the conference, we travelled by helicopter to visit several strategic areas including Panmunjom where the Peace Talks had been held ending the Korean War. I was particularly impressed by the youthfulness and high spirits of the Korean generals and admirals.

The Chinhae Conference itself was an unqualified success. It was, however, felt to be a modest beginning because only five countries, plus three localities, attended. The discussions were between private individuals; yet, Syngman Rhee, expressing his great personal interest in anti-Communism, said during a reception in his summer cottage in Chinhae that he hoped some way could still be found to move the nascent organization up from the pooples' to the government level.

As events unfolded, however, it became obvious that even if a governmental anti-Communist organization did

emerge, it would probably not last for long. Take, for example, SEATO: this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imed largely against Communist China and brought about by the efforts of the American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Foster Dulles in the nineteen-fifties, came to a quiet end as an organization in 1977.

The APACL as a private body, on the other hand, grew from eight units to its present thirty. It now covers practically the whole of Free Asia, Australia,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Pacific island state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Pacific states lead to the resolution at the twenty-ninth annual conference in 1983 to expand the name to the Asian-Pacific Anti-Communist League. Furthermore, from the APACL has emerged the formation of the World Anti-Communist League (WACL) which now encompasses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Europe, and Africa. Who at the time could have realized or ever hoped that the modest APACL started in Chinhae would expand into a world-wide movement?

The APACL has since contributed to the advance to freedom by exposing the falsehood and obsolescence of Communist ideology, the despotism and oppression of Communist rule, especially that of mainland China and the USSR, and the dangers of detente. The APACL has had to face the weaknesses, disunity, and shortsightedness of the free

countries as well as the united front tactics of the Soviet and Chinese Communists. Despite the inroads of the Communists into the free world, the APACL is prepared and determined to meet the long struggle ahead of us. The APACL and the WACL are not only redoubling their efforts, but have promoted into existence the World Youth Anti-Communist League (WYACL) and the Asian Youth Anti-Communist League (AYACL).

To turn back now to the memory of Chinhae when we were younger, it must be recalled that we had the benefit of the inspiration of the two great Asian anti-communist leaders, Chiang Kai-shek and Syngman Rhee, to guide us in our efforts to find the best means of fighting for freedom. The youths in their anti-Communist Leagues will benefit from our experience and memories, but it is to be hoped that they will innovate with new ideas and actions to meet the changing conditions of our common fight. The work among us will thus expand and be complementary.

Anti-communism needs most of all a sense of mission: an enthusiasm. There was plenty of enthusiasm at Chinhae. Our Korean colleagues and friends exuded it as they conducted the conference. They took it upon themselves to first sponsor the APACL and to build a Freedom Center to house anti-Communist offices and activities. The Korean chapter of the APACL now resides there as does the Secre-

tariat of the WACL. The Center, a fine multi-storied building located in a unique location in Seoul, has fast become a symbol of anti-Communism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PACL and WACL conferences used to be held there and now I understand regular courses are given there for local leaders to be more prepared to fight Communism. The anti-Communist enthusiasm engendered at Chinhae remains ingrained in the hearts of the Korean people, despite the vagarie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At Chinhae, the Chinese delegation was the largest from the outside nations. I was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friendly and almost intimat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our Korean hosts. These relations had been built up over the past decades.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Korea, a number of military and political leaders took refuge in China and had served with the Chinese Army and other institutions.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s Korea was gaining its independence, contacts remained frequent. In 1946 when Syngman Rhee return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Seoul, he stopped in Nanking. The leader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o had just returned from the wartime capital in Chungking, gave him a dinner party. I, a junior minister at the time, was chosen to give a welcoming speech in English. Though Rhee could write beautifully in Chinese, he could not speak the language and

none of the Chinese elders could use English as a working language. Thus I made the acquaintance of this distinguished statesman in a special manner which made my later visits to him on APACL business easier.

The sister Republics of China and Korea have historical,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bonds that made them natural partners. They both have suffered from Communism. They are both divided countries. They both face the Communist threat. Although their subsequent politic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have diluted, to a degree, their common interests, they still should be able to form the basic alliance necessary to maintain Northeast Asian peace and security.

One of the common interests shared by the two countries is the maintenance of the freedom of the sealane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The threat against the sealanes' safety comes from possible Communist interference and from pirates. In the last six years, I have promoted the foundation and operation of Sea Lane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Groups in the four Northeastern Pacific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 S. A. After these four nations met for the first SLOC conference held in October 1981 in San Francisco, the movement was extended to include ASEAN and the Australasian countries. A second, larger, conference was recently held in Toky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SLOC conference will

take place in the near future in Singapore.

The freedom of the SLOC is a single aspect of the overall security problem confronting Asia and the Pacific. An attempt to come to grips with the myriad facets of peace and secur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was conducted at a recent conference in Seoul. Inspired by the initial and promised success of the SLOC Study Groups, the Asia and World Institute, a body initiated by the APACL Secretariat,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Pacific Community Institute, U. S. A.; and the Institute of Foreign Affairs and National Security, ROK, held the first Pacific Security Conference in Seoul in January 1984. Participants from the U. S. A., Japan, Thailand, and the ROC were there together with a large and strong delegation from the ROK. It was, I hope, an auspicious beginning for a coordinated effort to promote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region. Although these efforts are not interrelated to the work of the APACL, they are in some measure inspired by its example.

The annual conferences of the APACL are an essential part of its activities providing for the exchange of ideas and experiences. But, they are only one part of the manifold activities of the League. Many works in many fields are performed by the Secretariat, the national and area chapters, and the observer groups.

As the APACL marches into its fourth decade of exist-

ence, we can do no better than to commemorate its thirtieth anniversary by vowing to redouble our efforts to advance the thought and action of anti-Communism.

附錄五　第三十三屆亞盟大會 (1987.8.16~8.23) 報告

Dr. Han Lih-wu

Tribute to Mr. Kishi

Two days ago we had the occasion to stand for a couple of minutes for the demise of Mr. Kishi. I want to praise him because he was a great supporter of APACL. You know the importance of Japa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and we tried very hard to have Japan as a member at the start of our movement. I went to the Republic of Korea to persuade the then President Singman Rhee to agree to accept Japan. I won't go into detail on all our valid arguments but finally, after a couple of years, Japan participated in our movement and also established formal relations with the Republic of Korea. At the first Conference held in Tokyo Mr. Kishi, as the ex-Prime Minister, was elected Chairman of the Conference. That was in 1962. From 1962 to 1970 he acted as Chairman of the Japan Chapter and gave us

great support. But by 1970 he was too involved in oth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had to designate Mr. Kuboki as acting Chairman. Dr. Kuboki was later elected Chairman of the Japan Chapter and has since been active at APACL and has given us his strongest support. You know he is Chairman of the "Victory Over Communism" movement. So now we praise the memory of Mr. Kishi for his support and his foreight in choosing Dr. Kuboki to be his successor at APACL. So today—the funeral was on August 9—we still remember Mr. Kishi as a great supporter of APACL and we are mournful about his demise, but I'm sure that this effort in having Dr. Kuboki as his successor will continue to be successful and helpful to APACL.

Developments in Southeast Asia

Not only do we have a good Chapter in Japan, but we also have good chapters in Southeast Asia. In ASEAN countries and all the Asian countries—Malaysia, Indonesia, the Philippines, Thailand and elsewhere—they have local chapters which are quite active; and Mr. Johari, I am glad to say, has recently been given an honorary title, "Tan Sri." We congratulate Mr. Johari for this high honor. He has been very active with APACL. But coming to Thailand we have a new Chapter Chairman and that is General Pratiab. He succeeded General Prapong who has

been Chairman for many years and we're glad to have most of the old members remain active in the Chapter. But I'd like to report to you that the King of Thailand is an important stabilizing factor in Thailand; and he will be remembered as the sovereign who guided the country from military domination to parliamentary rule. The Thai King is celebrating his 60th birthday this year. You may say that sixty is not a very long term but I remind you that Thailand is a Buddhist country and as Buddhists they believe in cycles. Sixty signifies the completion of five cycles. They believe that human life is a matter of cycles. You may be a man this time; the next time you may be a woman. The completion of five cycles is taken as a most significant birthday in Buddhist countries like Thailand. They are going to have a big celebration and on May 9 this year the Thai King Bhumibol was declared "Bhumibol the Great." It is a special honor for the King to be called "the Great," because after a census taken by the Thai Government, the people unanimously agreed to have the title conferred on His Majesty. So after the census, they formally declared the King as Bhumibol the Great, (Applause) and judging by the applause I'm going to send a cable to him in December when he actually celebrates his birthday anniversary on December 5, saying that APACL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him and hopes that he will continue to live a long life,

leading Thailand further onto the path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Applause)

From Thailand I'd like to come to the Philippines. We have our Philippine friends here and I must say that the Philippines has the highest democratic spirit in the American sense of all the Asian people. I happen to know President Aquino personally and knew her husband, whom I befriended when I was Ambassador there and supported in his political activities. In fact, I was one of the people who tried to persuade him to return to Manila as he was stay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did come to Taipei in 1983 on his way to Manila and I was the one who last saw him and helped him to go aboard a plane, but unfortunately when he arrived in Manila he was shot. I was sorry when I read the news, but as I was feeling rather depressed because I had a personal part in persuading him to go back to Manila, I recalled what the Father of the Philippines, Rizal, said when he was condemned to death. Rizal said, "It is beautiful to die so that she may live!" (It is beautiful for a martyr to die so that the country may live.) (Applause) Mrs. Aquino was subsequently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ey called the force behind the process: "Peoples' Power." However, it doesn't mean that any other country can follow these steps, because in the Philippines they have a special situation in which the Catholics play a

very important part. The Catholic leaders all supported Aquino and condemned Marcos. Also the army has had a small but growing Committee for reform and the leader of the present Philippine Chapter is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army that wanted reform. There are also other factors such as American help—America had helped Marcos, but after having seen what Marcos did, they withdrew their help and helped Aquino. However, as I said, the democratic spirit is most outspoken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re are opponents of Mrs. Aquino in the army also. They'll try to start a coup at any time, but I think as time goes on the support will be with Mrs. Aquino. I hope for the best for the Philippines towards real democracy.

Developments in Northeast Asia

Now let me pass to Northeast Asia. With the example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current tendency of the whole world toward democracy, you all know what happened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under President Chun. They had decided not to discuss a change in the Constitution or hold free elections of a President by the people, but ow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the leader of the governmental party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change and decided to proceed with reforms. It was a remarkable change and I must say I have the highest regard for Mr. Roh, who is now the

Chairman of the ruling party. What we hope is that North Korea will not take the chance to disturb the peace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especially during next year's Olympic Games. At present the Republic of Korea is going through an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the labor unions sometimes resort to strikes. We all know what our Korean friends can do i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They can proceed very fast and make rapid progress and I hope that all their trouble will eventually calm down and that the Republic of Korea will be able to have a successful election of the next President. But there are several important questions: One,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with the military? Two, what is the U. S. policy? And three, what are the two Kims—the opposition leaders—going to work out? All these factors, taken together, suggest the next couple of months is a transitory stage and we hope for the best for the Republic of Korea, which founded the APACL. We started the APACL in Chinhae and we owe our gratitude to the country for founding APACL.

While the Republic of Korea is proceeding on a democratic way, you all know what happene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29 years of martial rule we dispensed with Martial Law and now allow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political parties and we think the country will proceed smoothly towards more and bette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lthough I must say that in the Asian countries democracy is after all a recent development, the people sometimes resort to mob rule if they cannot get what they want from the government. To resort to mob action is not the best way of achieving democracy, but I hope that this is a transitional stage and that gradually in all the Asian countries democracy will grow on a more stable basis.

Develop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 we now come to the Middle East. You all know the Middle East is full of trouble, especially with the war between Iran and Iraq. But fortunately in the Middle East, we have a country which is a stabilizing element for the whole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at is Saudi Arabia. (Applause) And Mr. Amawi, you can see the support in our conference for Saudi Arabia, and, if I may report to you, APACL is appreciative of the Government of Saudi Arabia for giving U. S. $30,000 to APACL. In thanking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Saudi Arabia I took the occasion to send them greetings to say we fully support the Saudi Arabian Government for settling the incident at Mecca when there were so many rioters. Saudi Arabia handled the situation calmly, settled it and didn't allow it to deteriorate. We of APACL stand for the sanctity of any and every religion. We don't

want politics to interfere with religion and we support your stand. I think that all our members have the same feeling that we, APACL, respect all religions and do not have any special interest in any religion; but we do not want any interference with religious work. Our principal aim is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We hope that the Gulf War will not really spread disaster 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by escalating the conflict. My only regret is that Dr. Tevetoglu is not here this time and the Middle East organization can only have a luncheon today to exchange views for the furtherance of activ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Developments in the South Pacific

Unfortunately, some of the organiza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ve been weakened. For instance, ANZUS has been weakened by the action of New Zealand to ban atomic bombs and neutralism has been encouraged. To us there is no neutralism between communism and democracy and so we hope that this tendency towards neutralism is a trenchant matter. On the other hand, we are sympathetic to the newly established countries in the South Pacific. They want their independence and they don't want to be involved in the so-called struggle between the superpowers. That is understandable and we also, while we push fo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ake kindly to these local problems. But on the whole I would say that the stand of APACL is that there is no neutralism between freedom and slavery.

On Leadership of the Free World

Now people s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nfluence in the world is going down as well as its economic supremacy. We read in the papers every day how the United States is being confronted wi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On the other hand I would not s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down. I would say that the present world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 matter of multilateral interests and leadership. So we have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Europe and we have Japan. In European countries, West Germany stands out as a leader. With West Germany,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cooperation I think the Free World has a collateral leadership instead of a single leadership which is not bad for us. We hope that the colleetive leadership will last and help the Free World to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gress.

On the Case of Rama Swarup

Now I have taken a lot of time. Let me return to a specific problem among our friends: I refer to the problem

of Rama Swarup, who used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Indian Chapter. Rama was fortunately freed from prison on May 9 but he has been under house arrest. The Indian Government charged him with all sorts of things, but with his lawyers he was able to dispose of all these charges and according to Rama it will probably be another five or six months before he can be freed from house arrest. But it might take one or two years to clear up the whole case; so what he needs is financial support. The APACL Secretariat has twice given him a financial grant of U. S. $300 and I am glad that other chapters have also supported this including the World Youth Freedom League and I hope between now and the end of the year our friends in APACL and WACL will try to raise some more money for him. He would need U. S. $30, 000. Of course, we cannot give him U. S. $30, 000 but we can give him some financial help.

On Funding APACL

I've distributed the accounts for last year's Conference in Tokyo and I've also distributed to you the financial budget of the Secretariat from July this year to June next year. We have a bigger budget than the WACL Secretariat because the APACL Secretariat handles all sorts of symposia and publications. As you will see on that part of the budget, I myself as Secretary-General have not taken any

salary. I renounce all salary. I would appeal to you for financial support of APACL. I hope to establish a reserve fund for APACL to meet with exigencies like the Rama Swarup cas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apters. We, the Secretariat, will not touch any contribution from member units. We will use them only in cases of emergency and to help expand our organizatio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branches in the South Pacific, Indian Ocean and elsewhere. The Secretariat will submit an account to the APACL Executive Committee to examine if we get any contributions for any reserve fund, but I promise you that the Secretariat will not touch a single cent of your contributions for our own use. What we are doing is for the work of APAC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 personally think that the next few years are going to be very crucial to the whole Free World, and especially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and I hope that we will redouble our efforts towards our aims.

Thank you for being patient with me.

附錄六　參考資料

1.杭立武　國民政府時代之中英關係　臺北　臺灣商務　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2.杭立武編著　中華文化播遷記　臺北　臺灣商務　民國七十二年二月二版。

3.P. Van de Meerssche, A Life to Treasure: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Han Lih-Wu, The Sherwood Press, London, 1987。

4.杭立武　「籌組南京淪陷後難民區的經過」　傳記文學第四十一卷第三期　民國七十一年九月。

5.杭立武口述　程振粵筆記　「回顧與前瞻」　傳記文學第三十九卷第六期　民國七十年十二月。

5.杭立武　「中國政治學會沿革」　政治學報第十期　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

6.那志良　「復員後的故宮博物院」　傳記文學第三十八卷第二期　民國七十年二月。

6.張振義撰作　杭立武修訂　「東海大學創校經過」　傳記文學第三十六卷第六期　民國六十九年六月。

7.程振粵　「我國歷史文物三度播遷的一頁珍貴史料」　傳記文學第十一卷第五期　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

索　引

一　畫

一九一九年俱樂部　6

三　畫

山東八所聯合中學　41

四　畫

方東美　3, 4
戈公振　89
尹仲容　80
孔祥熙　43, 44, 87, 88
王世杰（雪艇）　10, 11, 20, 30, 40, 49, 87, 92, 107
王作榮　63
王迎先　69, 70
王紀五　63, 75
王國璋　42
王曾才　42
王雲五　20, 21, 22, 105
王德毅　42
文學革命　4
中央大學柏溪分校　33
中央研究院　10, 30, 31, 82, 8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31, 82, 86, 87
中央博物院　15, 30, 34, 68
中央圖書館　15, 31, 32, 68, 87
中印協會　86
中英文化協會　18, 19, 91, 98, 99
中英文化經濟協會　19
中英文教會　30
中英庚款（見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
中英基金會　10
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　26, 27, 72
中國人權協會　26, 68-73
中國公園　56
中國心理、生理研究所　17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　68, 69, 85
中國地理研究所　17
中國佛教會　26
中國美術學院　17
中國政治學會　9, 10, 18
中國紅十字會　25, 26
中國訪英團　20-2
中國蠶桑研究所　17
中菲遣僑協定　55

支援香港居民之友運動（港友會） 73, 98

五 畫

外交部 31, 52, 53, 57, 58, 61, 63
臺灣土著的傳統社會文化與人權現況 70
甘肅科學教育館 17

六 畫

朱 炎 42
朱宏志 75
朱家驊 13, 14, 30, 31, 35, 79, 86
自由中國半月刊 92
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 46
行政專科學校 39

七 畫

宋子文 44, 87, 88
宋長志 19
宋美齡 83, 84, 91
宋楚瑜 75
宋慶齡 91
江精衛 90, 93
汪繼武 17
李 濟 31, 32
李宗仁 92
李承晚 67
李劾黎 15
李惟果 20
李國鼎 16, 80
李雅仙 33
李登輝 63, 80
杜光塤 11
杜蘅之 75
何九思 34
何應欽 44, 89
伍叔儻 17
吳玉璋 30
吳約明 70
吳敬恆 17
吳貽芳 83, 84
呂秀蓮 70
那志良 30

八 畫

林義雄 71
林語堂 85
邵力子 3
邵元沖 9
邵玉銘 75
周至柔 33
周書楷 63
周恩來 88
周鯁生 10, 11
亞太地區法律服務研討會 70
亞洲基金會 32
亞洲與世界社 74, 75, 77
亞盟（APACL） 17, 67
河西中學 17
河南博物館 41
東海大學 46, 47, 48, 79, 81
長白師範學院 41

青年輔導處　38
金陵大學　3, 23, 83, 90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24, 83, 84, 90, 97, 108, 109

九　畫

胡　適　4, 18, 90, 92
胡　霖　20
胡秉正　17
兪鴻鈞　11
段茂瀾　55
南京大屠殺　25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　23
南京難民區　23-5, 29, 30
故宮博物院　17, 24, 29, 30, 33, 81, 87
威斯康辛大學　6
美國紐約教會聯合董事會　47
美國聯合援華會　83

十　畫

唐生智　24, 25
浦薛鳳　10, 11
高一涵　11
高去尋　32
高俊明　11
高鴻縉　32
孫　震　63, 75
孫先生（孫中山）　3
班鎭中　33, 34
秦德純　41
馬洗繁　11
馬超俊　24, 29
徐公超（可熛）　17, 47
徐柏園　32
秘雕　71
海線交通研究會　77, 99
倫敦政經學院　6
留英同學會　99

十一　畫

梁啟超　7
梁實秋　43
淩鴻勛　84
章太炎　7
章孝慈　75
郭婉容　63
張　羣（岳軍）　24, 29, 30, 35, 43, 44, 89, 105
張人傑　17
張大千　34, 35
張玉法　42
張君勱　94, 95
張忠紱　11
張金鑑　33
張奚若　10
張匯文　13
張銘傳　70
張厲生　49
張慰慈　11
連　戰　11, 63, 75, 81
連震東　81
梅月涵（貽琦）　92
梅光廸　4, 5, 14, 90, 92

曹俊漢 75
陳 明 75
陳 菊 71
陳 源 89
陳 誠（辭修） 39, 40, 46, 49, 53
陳之邁 11, 54
陳文成 71
陳立夫 35, 79
陳治世 11
陳奇祿 19, 75
陳果夫 79
陳啟天 32
陳裕華 90
陶英惠 42
莊尚嚴 30
訪英筆記 21
陳西協定 55
國立中央博物院館聯合管理處 31, 87
國立歷史博物館 34
國立編譯館 43
國際人權協會 69
國際扶輪社中華民國總會 26
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 26
國際難民服務團協調委員會 27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64
國際關係研究所 63, 64, 81

十二畫

馮玉祥 83
曾約農 48, 49
溫源寧 20
黃正銘 11
黃君璧 32
黃朝琴 42
傅秉常 94
傅斯年（孟眞） 31, 85-7
程行可 34
程振粵 19
湟川中學 17
敦煌壁畫 34-6
援助流亡中國知識分子協會 45, 46
華美協進社 42

十三畫

雷 震 92
賈景德（煜如） 35, 84
楊一峯 33
楊杏佛（銓） 10, 14, 17, 68, 69, 85, 87
楊步偉 85
楊希震 43
楊師庚 30
楊端六 18
葉公超 18, 49
葉恭綽 18
董作賓 32
滇緬公路 19, 20

十四畫

遣僑協議備忘錄 55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 5, 10, 13, 17, 18, 23, 30, 68, 80, 82, 84, 90,

94

十五畫

鄭　斌　94
鄭天錫（弗庭）　93, 94
鄭介民　49
鄧穎超　88
蔡元培　5, 10, 17, 68, 69, 82, 83, 85
蔣夫人（見宋美齡）
蔣先生（蔣中正、蔣委員長、蔣總統）　19, 20, 29, 30, 32, 33, 35, 43, 44, 51-3, 55, 58, 61, 67, 82, 87, 88, 89, 92, 93
蔣廷黻　11
蔣復璁　87
蔣經國　50, 63, 64
蔣碩傑　63
蔣穀蓀　32
劉大中　63
劉天祿　27
劉介宙　27
劉馭萬　52

十六畫

閻錫山　34, 44, 83, 84
蕭公權　11
錢端升　10, 11, 18
導淮委員會　79
默江中學　17

十七畫

戴傳賢（季陶）　9, 86
聯合中學　38
聯合國　27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58
豫衡中學　42
臨時中學　38

十九畫

羅家倫　32, 48

二十畫

嚴家淦　58, 83

二十一畫

顧孟餘　90
顧維鈞　50

A. D. Lindsay　15
Arthur Redford（雷德福）　29
Bertrand Russell（羅素）　6, 7
Carton de Wiart（魏亞特）　19
Claire L. Chennault（陳納德）　45
Clarence Hanmilton　3, 4
David Rowe（饒大衛）　32
Ferdinand E. Marcos（馬可仕）　55-59
Frederick Ogg　7
George Ashmore Fitch（費吳生）　24, 30, 46, 97
George Bernard Shaw（蕭伯納）　6, 7
Harold Joseph Laski（拉斯基）

6, 7, 94
James E. Carter (卡特) 69
John Dewey (杜威) 7
Michael Lindsay 15
Miles Wedderfurn, Lampson (藍浦森) 18
Miss Fortune 97
Gen. Phao (乃砲) 49
Gen. Prapas (乃巴博) 50
Richard M. Nixon (尼克森) 48
Sarit Thanarat (乃沙立) 49, 50, 51
Gen. Thanom (乃他儂) 50
Thomas W. Graham (葛蘭翰) 47
Walter Henry Judd (周以德) 46
William P. Fenn (芳威廉) 47
William W. Harnell (賀耐) 14
Winston Churchill (邱吉爾) 19, 2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

壹、中國近代史資料彙編

(一) 海防檔 十六開影印本，整部出售

咸豐十一年至宣統三年（1861—1911） 46年9月出版

購買船砲 福州船廠 機器局 電線 鐵路	精裝本九册	新臺幣 美元	3,600元 120元
	平裝本十七册	新臺幣 美元	3,300元 110元

國外郵柒費另計

(二) 中俄關係史料 十六開排印本，分册出售

甲編 民國六年至八年 (1917—1919)

書名	出版年月	册數	精裝本	
			新臺幣	美元
外蒙古	48.10	1	480元	16元
中東鐵路	49. 4	2	570元	19元
俄政變與一般交涉	49.12	2	1,020元	34元
東北邊防	49. 8	2	720元	24元
新疆邊防	50. 6	1	300元	10元
出兵西伯利亞	51. 8	1	480元	16元
合計		9	3,570元	119元

國外郵柒費另計

乙編　民國九年 (1920)

書名	出版年月	冊數	新臺幣	美元
俄政變	57. 1	1	480元	16元
一般交涉	57.12	1	480元	16元
中東鐵路與東北邊防	58. 6	1	480元	16元
國外郵寄費另計				

丙編　民國十年 (1921)

書名	出版年月	冊數	新臺幣	美元
一般交涉	62.12	1	570元	19元
中東鐵路與俄政變	63. 5	1	570元	19元
東北邊防與外蒙	64. 5	1	570元	19元
國外郵寄費另計				

（三）礦務檔 同治四年至宣統三年（1865-1911） 49年8月出版

十六開影印本，精裝八册，整部出售，售價新臺幣 3,000 元，美元 100 元，國外函購郵費另計。

（四）中法越南交涉檔

光緒元年至宣統三年（1875-1911） 51年12月出版

十六開影印本，精裝七册，整部出售，售價新臺幣 2,400 元，美元 80 元，國外函購郵費另計。

（五）道光咸豐兩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

道光二十二年至咸豐十一年（1842-1861） 55年2月出版

十六開排印本，精裝一册，售價新臺幣 480 元，美元16元，國外函購郵費另計。

（六）四國新檔

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二年（1850-1863） 55年2月出版

十六開影印本，精裝四册，整部出售，售價新臺幣 2,200 元，美元73.5元，國外函購郵費另計。

（七）中美關係史料

輯別	出版年月	册數	新臺幣	美元
1.嘉慶道光咸豐朝 2.同治朝 上、下	57.12	3	1,500元	50元
3.光緒朝 一	77. 2	1	1,200元	45元
4.光緒朝 二	77. 6	1	1,500元	50元
5.光緒朝 三	78. 4	1	1,500元	56元
6.光緒朝 四	78.12	1	1,500元	56元
7.光緒朝 五	79. 9	1	1,800元	67元

（八）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强認識資料彙編

輯別	關涉時間	出版年月	册數	定價	
				新臺幣	美元
1	道光元年至咸豐十一年（1821-1861）	61.11	2	1,050元	35元
2	咸豐十一年至同治十三年（1861-1875）	73. 6	2	1,400元	47元
3	光緒元年至光緒十九年（1875-1893）	75. 6	2	1,200元	40元
4	光緒二十年至光緒二十六年（1894-1900）	77. 8	2	1,200元	40元
5	光緒二十七年至宣統三年（1901-1911）	79.12	2	2,500元	93元

（九）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

同治三年至宣統三年（1864-1911） 61年12月出版

十六開影印本，精裝十一册，整部出售，售價新臺幣 4,200 元，美元 140 元，國外函購郵費另計。

（一〇）教務教案檔 各輯均十六開影印本，整部出售

輯別	關涉時間	出版年月	冊數	定價 新臺幣	定價 美元	國外郵購加郵紮費美元
1	咸豐十至同治五年 1860-1866	63. 2	3	1,710元	57元	
2	同治六至九年 1867-1870	63. 8	3	1,710元	57元	
3	同治十至光緒四年 1871-1878	64. 2	3	1,710元	57元	
4	光緒五至十二年 1879-1886	65. 5	3	1,710元	57元	
5	光緒十三至二十一年 1887-1895	66.10	4	2,280元	76元	
6	光緒二十二至二十五年 1896-1899	69. 9	3	2,000元	67元	
7	光緒二十六至宣統三年 1900-1911	70.11	2	1,500元	50元	

（一一）中日關係史料 十六開影印本，分冊出售

書名	出版年月	冊數	定價 新臺幣	定價 美元	國外郵購加郵紮費美元
歐戰與山東問題 (民國三至五年，1914-1916)	63. 8	2	760元	25.5元	
郵電航漁鹽林交涉 (民國元至五年，1912-1916)	64. 3	1	380元	13.0元	
通商與稅務 (民國元至五年，1912-1916)	65. 6	2	950元	32.0元	
路礦交涉 (民國元至五年，1912-1916)	65. 9	1	570元	19.0元	
二十一條交涉 (民國四至五年，1915-1916)	74. 7	2	900元	30.0元	
一般交涉 (民國元至五年，1912-1916)	75. 6	2	1,400元	47.0元	
山東問題 (民國九至十五年，1920-1926)	76.10	2	1,200元	40.0元	
東北問題（一） (民國六至十六年，1917-1927)	78.10	1	600元	25.0元	
東北問題（二） (民國六至十六年，1917-1927)	79. 6	1	600元	22.0元	

貳、史料叢刊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月	精裝本		平裝本	
			新臺幣	美元	新臺幣	美元
清末民初洋學學生題名錄	房兆楹輯	51. 4	75元	2.5元	45元	1.5元
伊犂交涉的俄方文件	袁同禮譯	55.11	75元	2.5元	45元	1.5元
朱家驊先生言論集	王聿均 編輯 孫斌	66. 5	200元	7.0元	180元	6.0元
詹天佑與中國鐵路	凌鴻勛 編著 高宗魯	66. 4	120元	4.0元	100元	3.5元
清季職官表附人物錄	魏秀梅 編	66.12	500元	17.0元	450元	15.0元
國民政府職官年表(第一册)	張朋園 沈懷玉 合編	76. 6	750元	25.0元	700元	23.5元
國民政府與韓國獨立運動史料	本所編印	77. 9	400元	13.5元	350元	12.0元
薛岳將軍與國民革命	陳存恭 賈廷詩 等編著	77.12	400元	13.5元	350元	12.0元
澳門香港之早期關係	郭永亮 著	79. 2	250元	10.0元	200元	8.0元
袁世凱家書	本所編印	79. 6	250元	10.0元	200元	8.0元
德國外交檔案	郭恒鈺 羅梅君 合編	80. 4	250元	9.5元	200元	7.5元

叁、口述歷史叢書系列

書名	訪問者	紀錄	出版年月	精裝本		平裝本	
				新臺幣	美元	新臺幣	美元
1.淩鴻勛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林能士 藍旭男	71. 3	250元	8.5元	200元	7.0元
2.林繼庸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林泉	林泉	72. 1	200元	7.0元	150元	5.0元
3.徐啟明先生訪問紀錄	陳存恭 賈廷詩	陳存恭 賈廷詩	72. 5	200元	7.0元	150元	5.0元
4.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 上、下册	馬天綱 陳三井 陳存恭	馬天綱 陳三井 陳存恭	73. 5	550元	18.5元	500元	17.0元
5.周雍能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陳三井 陳存恭	73. 6	200元	7.0元	150元	5.0元
6.戢翼翹先生訪問紀錄	李毓澍	陳存恭	74. 4	200元	7.0元	150元	5.0元

7.王鐵漢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林　泉	74. 5	250元	8.5元	200元	7.0元
8.王奉瑞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陳存恭	74. 6	250元	8.5元	200元	7.0元
9.于潤生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林　泉	75. 4	250元	8.5元	200元	7.0元
10.石　覺先生訪問紀錄	陳存恭 張　力	張　力	75. 2	500元	17.0元	450元	15.0元
11.張式綸先生訪問紀錄	陳存恭	官曼莉	75. 2	300元	10.0元	250元	8.5元
12.董文琦先生訪問紀錄	張玉法 沈松僑	沈松僑	75. 6	300元	10.0元	250元	8.5元
13.劉景山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陳存恭	76. 2	170元	6.0元	120元	4.0元
14.白　瑜先生訪問紀錄	郭廷以 張朋園	馬天綱 陳三井	76. 4	250元	8.5元	200元	7.0元
15.郭廷以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陳三井 陳存恭 林　泉	陳三井 陳存恭	76. 6	250元	8.5元	200元	7.0元
16.袁同疇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馬天綱 陳三井	陳三井	77. 6	250元	8.5元	200元	7.0元
17.勞聲寰先生訪問紀錄	黃嘉謨 陳存恭	陳存恭	77. 9	250元	8.5元	200元	7.0元
18.盛　文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林　泉 張俊宏	張俊宏	78. 6	210元	8.0元	160元	6.5元
19.於　達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林　泉 張俊宏	張俊宏	78. 7	200元	8.0元	150元	6.0元
20.鄧家彥先生訪問紀錄	郭廷以 王聿均 謝文孫 劉鳳翰	謝文孫 劉鳳翰	79. 6	250元	9.0元	200元	7.0元
21.鄭天杰先生訪問紀錄	陸寶千	官曼莉	79. 6	300元	11.0元	250元	9.0元
22.劉航琛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張朋園 劉鳳翰	張朋園 劉鳳翰	79. 6	280元	10.5元	230元	8.5元
23.杭立武先生訪問紀錄	王　萍	官曼莉	79. 6	250元	9.5元	200元	7.5元
24.魏火曜先生訪問紀錄	熊秉貞 江東亮	鄭麗榕	79. 6	250元	9.5元	200元	7.5元
25.齊世英先生訪問紀錄	沈雲龍 林　泉 林忠勝	林忠勝	79. 8	400元	15.0元	350元	13.0元
26.楊文達先生訪問紀錄	熊秉貞	鄭麗榕	80. 3	250元	9.5元	200元	7.5元
27.							

28.龍繩武先生訪問紀錄	張朋園 林　泉 張俊宏	張俊宏	80. 5	250元	9.5元	200元	7.5元
29.金開英先生訪問紀錄	陸寶千	黃銘明	80. 5	270元	10.0元	220元	8.0元

肆、名人日記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月	精裝本		平裝本	
			新臺幣	美元	新臺幣	美元
王世杰日記	王世杰著	79. 3	2,000元	80.0元	1,500元	60.0元
徐永昌日記	徐永昌著	79. 6	800元	30.0元	700元	27.0元

伍、專　刊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月	精裝本		平裝本	
			新臺幣	美元	新臺幣	美元
1.外蒙古撤治問題	李毓澍著	50. 4	130元	4.5元	80元	3.0元
2.甲午戰前臺灣之煤務	黃嘉謨著	50. 5	140元	5.0元	90元	3.0元
3.中國早期的鐵路經營	李國祁著	50. 5	120元	4.0元	70元	2.5元
4.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	呂實強著	51. 6	140元	5.0元	90元	3.0元
5.外蒙政教制度考	李毓澍著	51. 6	160元	5.5元	110元	4.0元
6.中英開平礦權交涉	王　璽著	51.10	120元	4.0元	70元	2.5元
7.黎元洪評傳	沈雲龍著	52. 1	(無書)			
8.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	李恩涵著	52. 5	150元	5.0元	100元	3.5元
9.清季兵工業的興起	王爾敏著	52. 7	120元	4.0元	70元	2.5元
10.中蘇外交的序幕	王聿均著	52.11	190元	6.5元	140元	5.0元
11.梁啟超與清季革命	張朋園著	53. 5	150元	5.0元	100元	3.5元
12.外人與戊戌變法	王樹槐著	54. 1	140元	5.0元	90元	3.0元
13.中美工約風潮	張存武著	54. 8	130元	4.5元	80元	3.0元
14.美國與臺灣	黃嘉謨著	55. 2	170元	6.0元	120元	4.0元

15.曾紀澤的外交	李恩涵著	55. 5	160元	5.5元	110元	4.0元
16.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	呂實強著	55. 8	130元	4.5元	80元	3.0元
17.西方曆算學之輸入	王　萍著	55. 8	130元	4.5元	80元	3.0元
18.中日廿一條交涉(上)	李毓澍著	55. 8	170元	6.0元	120元	4.0元
19.清末革命與君憲論爭	亓冰峯著	55.12	130元	4.5元	80元	3.0元
20.新建陸軍	劉鳳翰著	56. 5		(無書)		
21.魏源年譜	王家儉著	56.11	120元	4.0元	70元	2.5元
22.淮軍志	王爾敏著	56.11	170元	6.0元	120元	4.0元
23.咸同雲南回民事變	王樹槐著	57. 1	160元	5.5元	110元	4.0元
24.立憲派與辛亥革命	張朋園著	58.10	150元	5.0元	100元	3.5元
25.清季中俄東三省界務交涉	趙中孚著	59. 3	90元	3.0元	75元	2.5元
26.袁世凱與朝鮮	林明德著	59. 4	170元	6.0元	120元	4.0元
27.張之洞的外交政策	李國祁著	59.11	160元	5.5元	110元	4.0元
28.清季的立憲團體	張玉法著	60. 4	190元	6.5元	140元	5.0元
29.郭嵩燾先生年譜	郭廷以編	60.12		(無書)		
30.丁日昌與自強運動	呂實強著	61.12	200元	7.0元	150元	5.0元
31.庚子賠款	王樹槐著	63. 3	200元	7.0元	150元	5.0元
32.清季的革命團體	張玉法著	64. 2	220元	7.5元	170元	6.0元
33.論晚清兩廣的天地會政權	陸寶千著	64. 5	150元	5.0元	100元	3.5元
34.清末留日學生	黃福慶著	64. 7	140元	5.0元	90元	3.0元
35.張之洞與湖北教育改革	蘇雲峰著	65. 5	150元	5.0元	100元	3.5元
36.蔡元培年譜(上)	陶英惠著	65. 6	200元	7.0元	180元	6.0元
37.滇西回民政權的聯英外交	黃嘉謨著	65. 4	120元	4.0元	100元	3.5元
38.武衛軍	劉鳳翰著	67. 6	300元	10.0元	275元	9.5元
39.清韓宗藩貿易	張存武著	67. 6	140元	5.0元	120元	4.0元
40.劉蓉年譜	陸寶千著	68. 4	180元	6.0元	160元	5.5元
41.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	蘇雲峰著	70. 9	400元	13.5元	350元	12.0元
42.李鴻章與中日訂約	王　璽著	70. 9	200元	7.0元	150元	5.0元

43.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1916）	張玉法著	71. 2	600元	20.0元	500元	17.0元
44.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臺地區（1860-1916）	李國祁著	71. 5	450元	15.0元	400元	13.5元
45.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	黃福慶著	71.11	250元	8.5元	200元	7.0元
46.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	張朋園著	72. 2	350元	12.0元	300元	10.0元
47.列強對中國的軍火禁運（民國八年——十八年）	陳存恭著	72. 4	250元	8.5元	200元	7.0元
48.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江蘇省（1860-1916）	王樹槐著	73. 6	500元	17.0元	450元	15.0元
49.民初的政黨	張玉法著	74. 5	500元	17.0元	450元	15.0元
50.同盟會的革命理論：「民報」個案研究	朱浤源著	74. 6	350元	12.0元	300元	10.0元
51.陶澍在江南	魏秀梅著	74.12	300元	10.0元	250元	8.5元
52.華工與歐戰	陳三井著	75. 6	300元	10.0元	250元	8.5元
53.五卅慘案後的反英運動	李健民著	75.10	280元	9.5元	230元	8.0元
54.清代臺灣的綠營	許雪姬著	76. 5	350元	12.0元	300元	10.0元
55.平漢鐵路與華北的經濟發展（1905～1937）	張瑞德著	76.11	250元	8.5元	200元	7.0元
56.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國立中山大學（1924—1937）	黃福慶著	77. 6	350元	11.5元	300元	10.0元
57.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	呂芳上著	78. 3	450元	17.0元	400元	15.0元
58.近代中國的機械繅絲工業	陳慈玉著	78. 8	350元	13.5元	300元	11.5元
59.龍井林家的歷史	許雪姬著	79. 6	350元	13.0元	300元	11.0元
60.延安的陰影	陳永發著	79. 6	350元	13.0元	300元	11.0元
61.私立海南大學，1947～1950	蘇雲峰著	79. 7	300元	11.0元	250元	9.0元
62.趙聚鈺先生年譜	魏秀梅著	79.12	400元	15.0元	350元	13.0元

63.中國近代鐵路事業管理的研究—政治層面的分析，1876～1937	張瑞德著	80. 2	350元	13.0元	300元	11.0元

陸、集　刊

期別	出版年月	精裝本		平裝本	
		新臺幣	美元	新臺幣	美元
第一期	58. 8	280元	9.5元	230元	8.0元
第二期	60. 6	300元	10.0元	250元	8.5元
第三期（上）	61. 7	150元	5.0元	120元	4.0元
第三期（下）	61.12	240元	8.0元	200元	7.0元
第四期（上）	62. 5	240元	8.0元	200元	7.0元
第四期（下）	63.12	240元	8.0元	200元	7.0元
第五期	65. 6	250元	8.5元	210元	7.0元
第六期	66. 6	250元	8.5元	210元	7.0元
第七期	67. 6	360元	12.0元	320元	11.0元
第八期	68.10	300元	10.0元	260元	9.0元
第九期	69. 7	450元	15.0元	400元	13.5元
第十期	70. 7	500元	17.0元	450元	15.0元
第十一期	71. 7	500元	17.0元	450元	15.0元
第十二期	72. 6	550元	18.5元	500元	17.0元
第十三期	73. 6	500元	17.0元	450元	15.0元
第十四期	74. 6	500元	17.0元	450元	15.0元
第十五期（上）	75. 6	500元	17.0元	450元	15.0元
第十五期（下）	75.12	400元	13.5元	350元	12.0元
第十六期	76. 6	500元	17.0元	450元	15.0元
第十七期（上）	77. 6	500元	17.5元	450元	16.0元
第十七期（下）	77.12	500元	17.5元	450元	16.0元
第十八期	78. 6	750元	29.0元	700元	27.0元
第十九期	79. 6	750元	28.0元	700元	26.0元

柒、研討會論文集

書名	出版年月	精裝本		平裝本	
		新臺幣	美元	新臺幣	美元
近代中國維新思想研討會	67. 6			100元	4元
中國近代的維新運動——變法與立憲研討會	70. 8			150元	(無書) 5.5元
辛亥革命研討會論文集	72. 6	500元	17.0元	450元	15.0元
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	73. 4	700元	23.5元	600元	20.0元
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1912-1927) 上、下册	73. 4	1,400元	47.0元	1,200元	40.0元
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1928-1937) 上、下册	73.12	1,300元	43.5元	1,100元	37.0元
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1937-1945) 上、下册	74.12	1,400元	47.0元	1,200元	40.0元
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上、下册	75.12	1,400元	47.0元	1,200元	40.0元
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上、下册	77. 6	1,500元	53.0元	1,300元	46.0元
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	78. 4	1,500元	53.0元	1,300元	46.0元
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論文集	78.12	1,100元	44.0元	1,000元	40.0元
中國現代化論文集	80. 3	1,200元	44.0元	1,100元	40.0元

捌、史事日誌

書名	編著者	出版年月	精裝本		平裝本	
			新臺幣	美元	新臺幣	美元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第1册)	郭廷以著	68. 7	600元	20.0元	550元	18.5元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第2册)	郭廷以著	73. 4	500元	17.0元	450元	15.0元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第3册)	郭廷以著	73. 6	550元	18.5元	500元	17.0元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 (第4册)	郭廷以著	74. 5	700元	23.5元	650元	22.0元

玖、研究通訊

期別	出版年月	新臺幣	美元
第一期	75. 3	150元	5.0元
第二期	75. 9	210元	7.0元
第三期	76. 3	240元	8.0元
第四期	76. 9	240元	8.0元
第五期	77. 3	240元	8.0元
第六期	77. 9	280元	10.0元
第七期	78. 3	240元	9.5元
第八期	78. 9	250元	10.0元
第九期	79. 3	250元	9.5元
第十期	79. 9	250元	9.5元
第十一期	80. 3	300元	11.0元

拾、口述歷史（不定期刊）

期別	出版年月	新臺幣	美元
第一期	78.10	200元	8.0元
第二期	80.2	250元	9.5元

拾壹、目錄彙編

書名	出版年月	精裝本		平裝本	
		新臺幣	美元	新臺幣	美元
經濟檔案函目彙編 第一册 (1903～1937)	76.12	300元	10.0元	240元	8.0元

拾貳、特　刊

書名	出版年月	精裝本		平裝本	
		新臺幣	美元	新臺幣	美元
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	77. 6	350元	11.5元	300元	10.0元
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下)	78. 6	350元	13.5元	300元	11.5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叢書 (23)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六月出版
中華民國八十年六月再版

杭立武先生訪問紀錄

訪　問　王　萍
紀　錄　官曼莉
出版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　址　中華民國　臺北市　南港
定　價　平裝本新臺幣200元　美元7.5元
精裝本新臺幣250元　美元9.5元
國外訂購另收郵費
劃撥帳號　臺北郵政 103417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帳戶
訂購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電話 (02)7824166 轉 5109
承印者　永裕印刷廠
地　址　臺北市西昌街168號

（精）ISBN 957－9046－06－9
（平）ISBN 957－9046－07－7

Oral History Series No.23

THE REMINISCENCES OF MR. HAN LIH-WU

Interviewer:
WANG PING
Recorder:
KUAN MAN-L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990

ISBN 957-9046-07-7